社科專探八九

香港政治勢力新風景

我看見了……

七八十年代政治發展

中英政府

香港政府

階級分析

政黨政治

工商派

民主派

親中派

社科專探八九

香港政治勢力新風景

香港大學學生會

社 會 科 學 學 會

社科專探八九——香港政治勢力新風景

主　席：施　揚

撰稿人：李泳欣　謝家碧　黎定國　林秋雄　黃兆民　林庭和　郭文山　鄧慶端　吳鴻青

籌委：劉建彤　林碧霞　李翠恩　陳岳彪　黃框誠　莫尚明　關倩和　李德光　陳　偉　胡蕙芝　何志聰

目錄

前言

第一部分

一、香港七十及八十年代的政治及政治力量

第二部分

二、香港政治發展的上限——中國及英國政府的態度

三、政治轉變中的香港政府

四、香港社會——一個階級分析

第三部分

五、政黨政治的發展

六、香港各政治力量的發展與前景

七、結論——香港政治的幾個課題

前言

作爲「社科專探八九——香港政治勢力新風景」的主席，對於這本小册子這麽遲才出版，只有內咎和對各位致歉。可是，在自咎和致歉之餘，我仍得向大家介紹這本小書。

政治問題看起來很複雜，但其實說穿了，其中心問題只有一個，就是在社會中由誰控制其它人的命運。政治勢力其實就是爭奪控制權的眾多參與者，而對政治發展的研究就是對這些參與者與及所謂客觀環境的變化之研究。

香港在八十年代經歷了一場巨大的政治變遷。而社會科學學會在過去十年間亦作了不少研究，政治參與，代議政制發展以至公民教育都已觸及。在香港政治發展逐步走向由中國、港英政府及本土資本家所制定的「計劃民主化」之道路的今天，這本書代表了我們對這個藍圖的一個全面性分析。

第一部分是對香港在七十及八十年代政治及政治勢力的一個歷史性描述。第二部分是對香港政治變遷的分析。第二章討論中英政府的態度對香港政治發展的結構性限制。第三章討論在此結構性限制下香港政府的自主性和合法性問題及其動態。第四章則反過來，從階級分析的角度，探討在轉變的環境中，香港政治變遷的內部動力。第三部分是對香港政治前景的分析。第五章討論政黨政治，第六章分析香港三大政治力量陣營的發展，而第七章則總結了我們對香港政治前景的看法。

由於各章是由不同作者作編寫，故章節之間論點或有衝突。不過，其實分析只是代表了我們對現況的理解，改變歷史還是要靠實質的參與和行動。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對掌握自己命運的執着。

最後我要向各位參與這次社科專探的同學以及各提供資料的政治團體致謝。沒有他們的帮助，這本小册子可能要在更後的日子才能與大家見面，甚至可能不能順利出版。

施揚

九一年八月

第一部分

一、香港七十及八十年代的政治及政治力量

六十年代的香港，如夢初醒：上海資金企業、膠花假髮工展會、一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市民仍活於幹活謀生的框框內；英國也樂得維持這個相安無事的「香港系統」。

七十年代的香港，如箭在弦：六七年暴動一役，人口激增，階層結構複雜化、激化的學生運動、社會運動；政府回應以地方行政改革、「香港節」、「清潔香港」，一觸卽發。

八十年代的香港，如魚得水：地方行政、地下鐵、國際金融貿易通訊城市，政制民主化、官員本地化、論政團體政黨百花齊放，聯合聲明、基本法，通通破繭而出。

九十年代的香港，又是如……如何？

香港在短短幾十年的光景裏，經歷了錯綜複雜的變化，這一切的轉變及發展，又與香港內部、外部及參與者構成一個獨特的模式；可是，無論模式的轉化是如何，香港的政治經濟制度，仍然可以保持比較穩定的運作；要解釋這個現象，首要從香港的政治及政治力量，在七十及八十年代的歷史作出一個介紹。

追溯香港發展的源頭，自然是老生常談的不平等條約、漁港，地理上得天獨厚的天然海港，得宜的地理位置；而在政治方面，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港督是英女皇的香港代表，配以高層公務員洋人組合，與一群安於經濟表現的華籍市民，就構成了基本的香港模式。爲使分析系統化，我們嘗試從五方面的模式及學說，再疊上一些歷史的敍述，來了解香港政制的雛型：

一、香港「殖民地化」的程度

二、香港對英國及中國的「殖民功能」（Functional Utility）

三、行政吸納精英制度（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四、技術官僚模式（Technocratic Model）

五、家族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

在不同的時代，香港政府面對不同的社會政治環境，均作出不同的政策以作適應。

首先，香港的「殖民地身份」（colonial status），明顯地與其他英國殖民地有所不同。香港，作爲一個「城市國家」，一個無政黨行政主導模式，一個本身的整體；縱然香港的體制是緊緊跟隨英國的制度；港督享有的最高行政立法權、行政立法兩議會的諮詢協助，及忠於英國政府的公務員制……但仍然有其異於其他殖民地的獨有色彩。香港有着高度的自主權，反殖民意識薄弱，還有積極不干預政策：例如七五年香港便擁有處理外滙儲備自決權等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英國一直在港經營的那套，是在香港系統下，既不全盤西化，也不是傳統剝削的宗主殖民關係，而是一個獨特的「香港系統」（Hong Kong System）。

香港「殖民化」的程度愈來愈淺；而「非殖化」的意識更早在七二年中國亦已在聯合國會議提按中萌芽。

英國政府亦曾分別在四五年民主政制楊慕琦計劃提過「市議會」；六六年狄堅孫報告書的「大香港市議會」；六八年的民政工作計劃；及至中英談判英國近乎外交協議而不是實質的談判，後期的光榮撤退……這些都可以看出英國對處理香港殖民地位態度轉變的端倪：「離手」（hands off ），造就既定模式內自由發展，推出政策以穩定爲最大前題，經濟發展至上。在市民方面，於七十年代，大家心內既無什民族大義，亦無對統治國恨之入骨，偶然對「英國佬」的不滿，嬉笑怒罵，激進的學生運動，神會運動，唯有通過「脫軌政治架構」如請願 、示威、罷工等向政府表達。

這樣，英國編繪的殖民模式，就交由漸有社會觸覺的香港人演繹了；最重要的是在香港一直以來的安定系統內，殖民色彩漸沒落，加上草根階層漸漸不滿，內部矛盾及衝激亦恰在這時漸漸出場；而一群搞社會運動的大專生，衛道份子，就更在這時開始他們的熱身了。

從香港內部，引申到香港與中英關係的角度上，歸究其中，底線其實就在於香港可以起的作用及功能。這個三角關係的形成及運作，權力的分佈及影響力，其實在不同年代都對香港起着很關鍵的因素。

其實，中國對反殖民的意識是不難察覺的，香港沒有任何中國官方機構駐員，而是很巧妙地弄出一個新聞角式淪爲次要的「新華社香港分社」；七十年代一度全盛的所謂「左」力，例如勞工運動，左校學學等。但在另一方面，香港對中國所起的外交、貿易等的作用，也是中國一直的重點考慮，令他們在不願承認香港的殖民地位之餘，又不願提出反對。

至於八十年代熱門政治術語「一國兩制」的提法，其實早在一九七八年第十一屆中共的三中全會上已由鄧小平提出；雖然當時目的是針對台灣問題，但中國對香港的功能及各方面的重要性、主權問題等，已顯然是時間不短的部署，而不是八十年代中才突然平地一聲雷了。

在英國方面，上文亦已作出一些分析，她所扮演的角色也很清楚：光榮撤退是遲早的一日，而英國在香港的經濟表現上，也得到不少回報，底線只是她能怎樣避重就輕，在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保持友好，繼續維持她本身的利益罷了。英國怎樣在雙重權威（dual authority）下管治香港，下文八十年代的發展就會作更詳盡之分析。

提至第三個分析結構，就是金耀基（Ambrose Y. C. King ）的「行政吸納精英制度」。其中，「共治」（synarchy ）便是精要所在。

這個制度是指政府在一個過程中，「把社會中精英或精英團體」（elite group ）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進行政決策結構，因而獲致某一層次的「精英整合」（elite integration ）……」。這個「草尖式」的安排，不單只可以大大加強統治權力的合法性和認受性，更可以從共治中造就出「共識性政府的形式（elite consensual government ）。中國人的精英，不斷被納入行政體系之內，再加上行政立法兩局於七十年代的「官守」及「非官守」議員，都是香港的世家大族及經濟精英：這樣一個大聯盟，起了一個積極的非政治化作用：香港的既定模式，只是行政系統的運作及變化，而不是「政治」。

相對地，香港一般市民在此制度下既不被鼓勵關心政治，再加上本身的臣屬政治文化（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 ），對政事的冷漠及缺乏積極性，家族功能主義，精英整合就更可穩定地存在。不過，這樣的模式也因統治及被治者之間的溝距而會出現危機。

一九六六及六七年的動亂就正好說明了這一點。動亂平息了之後，港府面對的，是一個愈加複雜，與民衆脫節的大都會，民政主任制就是在這個時候，對草根階層作另一類的吸納。各政府部門的公共關係科，政府新聞處，政府極力鼓勵的互委會，大型的「淸潔香港運動」，甚至一九七四年成立的「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大型社會服務的發展，公屋建設等，都是吸納及安撫的手法之一。而香港社會漸漸蛻變的端倪亦漸漸顯示出，香港各階層人士也開始感到不足於這一個一直講求穩定的行政吸納制了。

可以說，這一個精英整合，爲香港的基礎起了一個穩定及鞏固作用。要有六、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就要有一個相安無事，有效率而安定的行政制度；「而跟隨而來的社會運動，壓力團體的紛紛萌芽，並不是什麽對抗性的產物，而是蛻變過程中其中的參與者」。所以無論行政吸納是否再不足以純爲香港合法性統治運作，但它所造成的基礎及蛻變的空間，實在是不容忽略的。

承接以上的行政吸納制分析，技術官僚模式（technoratic model ）也可部份反映香港的政治環境，它所包括的「少量政治參與」，由「非政治化的技術官僚在港督、司級官員的引領下掌握實際行政立法權，經濟發展」，及至「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各階層的要求，造成穩定性減低，隨之就是「參與爆炸」或冷漠的循環，都對香港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情況作了一些解釋。

至於第五個分析，仍針對前文所提及的政治冷漠感。我們可以根據劉兆佳的「家族功能主義」作出一些研究。在香港的中國人，對家庭觀念的重視，形成一個以「家庭」而非「個人」爲整個社會的單位的現象。家庭成爲人最終慰藉的地方，一切的爭取、努力，皆由家庭支持，回報也是天倫一起分享。相對地，「個人」對政府的要求及期望，自然亦很低，歸屬感及參與的積極性偏低就更是意料之事。

要了解香港的政治新風景，除了明白建制內的種種、何時直選、何時改制之餘，建制外重要一環的民衆基礎及政治文化，也是一些基本的要素。

以上的五個分析，可以將香港七十年代的政制發展，鈎劃出一個基本的輪廓。我們看到一個由殖民統治下生長出來的幼嫩華人社會，通過共治，精英共識，行政主導及官僚制度，來保持一個架構運作上的共識及穩定；相對地，一般市民就安於香港飛快的經濟表現，流於政治冷漠；權力中心亦緊緊地繫在行政官僚架構內；每當有各階層利益衝突時，也只會在建

制外，以社會運動作出反應，也恰是這一個蛻變過程的契機，香港的壓力團體及各方的政治勢力得以開始萌芽，磨拳擦掌，準備出閘；而出閘後的光景，八十年代政治模式轉向於各方勢力及權力結構分佈，風起雲湧，此起彼落，表面穩定型模式亦已被多元化的發展影響而要面對連串的挑戰。

權力結構是因應憲制的規定，以及憲制內外人士的活動而隨之變化的。而權力的分佈也不是恒久不變，而是在相互影響及運作下所產生的。任何一個遊戲參加者的改變，或是遊戲規則的變動，皆會帶來權力結構的重組。

一直以來，權力中心都是在政府內部，維繫於一班以港督、布政司、財政司等高官爲中心的政府官僚身上。政策的決定和立法的主動權，決定權皆集中在這批非政治化的管理行政人員身上。部份的權力即使是藉着行政吸納精英制度發放到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身上，和藉着香港政治委員會制度，來作與官僚架構以外的参政人士的權力分享（power sharing），去平衡政治矛盾和階級衝突。整個香港的決策機器都是離不開官僚架構上的行政主導運作爲中心。

可是，這個制度踏入八十年代後，便要接受一連串的考驗：先是前途談判，代議政制的進一步發展，爭取八八直選，大亞灣事件，基本法，八九民運，九一直選等等，都爲一個向以平穩見稱的政治制度帶來衝激。政府爲了面對這些挑戰，亦相應作出了「政制改革作爲回應」。最後這改革又如何改變權力架構呢？

先看政府方面的準備。

前途問題的出現，威脅了港英政府管治的認受性，正如前文所述的雙重管治（dual government），和中方治權的非正統介入，皆爲政府增添了限制，削弱她統治的獨立性，和減低了政府管治的效率。

另一方面，政府也要面對港人在「回歸中國」，「港人治港」等大前題引發下而逐漸增加的政治要求，還有参政人士、團體對政府在過渡期間的表現的種種不滿和不信任。

爲了更鞏固政府在過渡期管治的認受性和在港建立一套所謂植根於香港的政體，以使英國能在港光榮引退，和爲日後英政府引退後出現的權力眞空（power vacuum）培養接班人，更爲穩定港人信心以便在過渡期繼續其有效統治等原因，政府便開始了一連串的政制改革。

首先在八〇年推出地方行政白皮書，再在八二年開始引進區議會這產物，建立三層架構。這把原來的社會運動和地區事務工作者吸納進建制之內。這一方面可以產生安撫作用和使政府看來民主化，另方面亦能爲政府帶來更高的信任、認同感和認受性。而政府亦不需要在權力和決策上作出重大犧牲，三全其美。

接着來的前途談判，僵化的中英關係，香港前途的不明朗，港人在談判期間的缺乏参與，都成爲了考驗香港政治的另一難關。民間團體對政府在談判期間漠視港人意願作其枱底交易而表達的不滿令要求代議政制進一步發展的聲音加劇。另外，股市的不景氣，地產市道的中落，社會問題等亦進一步向政府加壓。

面對這些，港英政府的應變方法

仍進一步推行民主化。在八五年，政府予立法局也相應引入選舉。這個以選舉團和功能組別模式進行的間接選舉給予專業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一個参政的機會。而政府把部份政權與社會精英分享的做法，亦能令政府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此同時亦能加強這批對香港社會經濟有重大貢獻的關鍵人物對政府的認同感，和給他們一個参與規劃未來的承諾。這樣的部署在政壇上可發揮一個重要的穩定作用。

但這同時又受到來自中國方面的壓力，「不按本子辦事」，「港方搶閘」等壓力的限制。而港英的回應手法便是一張張的「民意牌」、「國際牌」等等。另外，港府所始料不及的種種其他事件，如大亞灣事件所引起的波瀾，亦使民間爭取民主化的聲音加強。基本法草議工作的種種不當，人們信心面臨崩潰，股災，移民潮等，亦再次考驗政府，挑戰其威信。

再加上個別政治勢力對八八直選的爭取都影響了政府代議政制的發展。整個計劃似是「宜快宜慢」，「不宜快不宜慢」，總之「順得哥情失嫂意」，兩難。

姑勿論如何，政府在不同時代的做法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便是要使社會安定。

看過政府如何作出反應，又再讓我們看看政府的回應怎樣影響政治勢力的發展。

在七十年代，各政治勢力一般都是在建制以外，以社會運動和居民運動作爭取。在八十年代，由於三層架構的開放，選舉的出現，社會人士便紛紛蠢蠢欲動，躊躇滿志，唯恐執輸，以爲可以藉此進入建制內，作其內外相互配合的爭取。一面監察政府運作，一面爭取民主化以作港人治港的準備。另外，由於過渡期時間有限，要在九七政治舞台上有所發揮，現在的政治地盤更是不容有失，是故各方政治勢力都作出響應和爭取。爲回應要求民主的勢力，作勢力平衡和使民主化步伐穩定，保守派人士亦相繼踏出政治舞台，唱其反調，要求把民主步伐放慢，要求有利於他們的政制模式等。

本地精英也在中英雙方政府放出的空間中盡量作其爭取，互相抗衡。而政府也樂意把中英間在政制上的矛盾下放至政治團體的層面上，讓左右兩方得以相互角力。

這選舉和参政空間的出現，正好提供一個大好良機已萌芽的政治勢力以一個更系統化及更大規模的形式参政，也使他們有機會動員更廣大的群衆基礎去加強其政治實力。各界政治人物的形象亦越趨鮮明，政治立場也更見明確，更有利於政治組合。至於他們的組合形式如何，意識形態等，則又與他們在七、八十年代的立場和歷史有着很大的關係。

本港政事一向有「個人化」的取向。雖然有政治團體的出現，但他們始終在組織上較着重個人，故亦容易被政府以其行政手法吸納進建制之內。

建制以外的政治活動，在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下，長久以來都受到局限，得不到發展的機會，一向只限制在爭取民生改善的範圍內。政治参與者因而也多是以社會運動，工運等形式作爭取。可惜這些力竭聲嘶的行動之後，換來的效果往往和預期的相差甚遠。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這些建制以

外的政治活動，無論在性質、手法，受關注的程度、層面、市民參與等等各方面，都因應時代的變遷，而突破了舊日局限。

中英談判，聯合聲明，九七過渡，港人治港的實現，主權的移交，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未來運作，凡此種種都給予政治參與者一個突變的機會和推動力。政治勢力亦藉權力替換的時機而紛紛組合、擴張，尤其在其活動層面和野心上。各方都希望在這權力重組的當兒盡量爭取有利位置，加入權力分享遊戲。

同時亦由於這時機的出現，使得一向以沉默見稱的香港市民，多對這些政治勢力及其活動關注起來。傳媒亦常以大量篇幅報導此等政治活動，再加上政府的鼓勵，使得一個在六、七十年代仍當殖民色彩，一向小談政治，家族功能主義當道的地方，突然變得在政治上活躍起來：談政制、爭民主、搞選舉、草憲法，果眞多姿多釆，應有盡有。

另一方面，一般市民在教育水平方面，也在這十年來有起碼的提升。再加上香港成熟的經濟環境，和隨經濟成長而來的中產階層擴張，也使得一般的公民意識和政治參與慾望增強了。

可是，政治的活躍性在整個香港的政治架構內所起的作用是受到很多限制的。原因在於前文一直提及的「香港系統」。

在這一個系統內，由殖民主義直至精英吸納，官僚架構及近期的「民主化」參政潮流，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個由宗主國所規劃出來的框框內。政治勢力發展的時機，模式和層次都受到局限，套用一句經濟學用語，乃被政治上「無形之手」所操縱。政治參與者由於擁有的政治資本和條件有限，故往往缺乏主動，只能在人家給予的範圍內盡量爭取。他們往往在一番大聲疾呼後，非但不能達到原本的目的，更可能被其他人利用爲政治注碼而不自知。

從政治參與者的角度，一批關心社會，滿腔熱血的大專生，自從七十年代初開始他們的政治參與後，一直在香港的政治舞台上打滾。他們在舞台上的角色，有時是主角，有時是配角，但大多數都似乎是丑角。總之，導演就永遠沒有他們的份兒。他們有時會吸引觀衆買票入場，但觀衆所抱的是純看戲的心理還是其他，就不得而知了。他們一番爭取之後的結果，往往亦是不了了知，而決策則早已在另一邊廂於他們忙於表演之時拍了板。所以，他們的參與，始終是進退兩難。身爲在香港既定政治模式上生活的政治人，他們只好轉彎抹角地找尋他們的出路了。

現在再綜觀各路參政者在政制改革中的角色和相應的權力結構改變。

在政府決策上，高官和公務員始終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另外，一般影響性較大的決策，實仍中英的腹地，權力中心更可架空港府官僚架構。政制上英方仍作主腦，而行政立法兩局雖擁有非官守和選舉議員，但可行使的權力有限，區議會更只是聊勝於無。

儘管各方的政治勢力紛紛出籠，但在實際權力分佈上，他們的重要性也相當有限，重要的只是他們的潛力。當然他們也有向政府施加一定的壓力，但由於各方的相互制衡，使政府不易受制。他們在權力結構重組過程

中可以掌握的也會是非實際的權力，如政府失去的威信等。只可惜，他們的旗幟不鮮明，立場亦見不定，至令他們未能完全掌握政府所失去的威信。他們只是在建制賦予的有限空隙下活動，有的只是爭取和參與的機會，但建樹多少，實際分享權力多少，眞是無人敢説。

簡短地作一個總結。七十年代的政治環境，乃是一個「內部穩定型」；八十年代則是「內外變化型」。在這二十年光景裏，香港由純「行政」的基建，到「政治」的互相角力；由行政吸納精英制，到民主化；由家族功能主義的政治冷漠，到政治參與活躍性的提高；由政治組織的雛型，到成型的政黨參政模式；由殖民地到將來的特區。這一切的蛻變和進展，又給各政治勢力帶來什麽新天地呢？在既定的政治模式內，各政治勢力又可怎樣各施各法，爲自己闖出一條康莊大道呢？

第二部分

二、香港政治發展的上限──中國及英國政府的態度

從中國與英國展開談判討論香港地位問題的一刻開始。（註一）香港便要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嶄新時期，一個封閉的殖民政體將會逐漸失去其權威性。代之而起是一個階段；舊有的政治體系衰落和一個新政治秩序建立的過渡時期。因此政治開放和改革似乎是必然和必要的。討論香港未來香港的政治發展比起討論任何舊有英殖民地非殖化時來得艱難、複雜。因爲香港是沒有獨立的可能性，香港回歸中國是必然的事實。新建立的政治秩序必定建立在『一個兩制』的前提下。因此，除了研究香港內部對政制開放的渴求外，英方與中方對政制發展的態度，尤其是後者，更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這亦是困難所在，因爲中、英雙方在討論香港問題時是不容香港人參與，許多討論都是流於外交層面，而其討論過程亦視之爲秘密。在討論過程裏，絕大部份香港人都被拼諸門外，因此我們只能從討論後的結果推敲中英兩方對香港政治發展的態度，所以其精確性有一定程度上的限制。

相信大家還記起在一九八二年九月，當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會見鄧小平後步出人民大會堂仆下臺階的景象。這標誌着英國人繼續統治香港的幻想經已破滅。香港歸還中國已是必然的現實。福克蘭戰爭的勝利並未帶來英國好運。反之，在香港問題上英國給中國打敗了。究其原因：英國低估了中方在香港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及高估了其管治精英在香港群衆裏的影響力，他們未能動員香港群衆支持英國繼續管治香港。反觀中國，她在同一時間推出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針來解決香港問題得到較廣範群衆支持，尤其是中產階級。這可體現於當時新興的大量由中產階級組成的論政團體紛紛表態支持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及在港實行港人治港政策。這無疑地把港英統治精英狠狠地打了一己耳光。港英政府在這役的失敗對其管治的權威性更是有深遠的影響。

既然香港主權交還中國已成定局。英國對香港問題上便作出了調整：香港不論在經濟上或政治戰略上對英國有極其重要位置的！經濟上，英資本家在香港有很龐大的投資和經濟利益，他們在經濟上的勢力必定有最低限度的保障。在香港的經濟勢力對協助英資本打進中國市場有極重要位置。

政治上，爲保持英國在東南亞事務上的影響力，香港因此具很重要戰略價值。交還香港主權對英國與中國保持長久良好關係更具有積極意義。

要達致以上目標，英國必然要在香港實行政制改革，採取主動，令英國仍能在回歸中國後的香港維持一定的勢力。若要達此目標，港英政府必然要在過渡期內有效管治香港。

▲過渡期政府的挑戰

港英政府在過渡期內有效地管治香港比起任何時期也來得艱難。對英國政府來說，殖民地統治快將結束，把一定的政治權力轉到港人手上，便成爲當前急務。這些政策重要性有：(1)滿足更多人（尤其中產階級）要求增加政治參與渠道。對政府而言，擴大政治參與不單爲爭取更多市民有政治上的支持，這對港英政府在過渡期內有效管治具有積極意義。(2)由於時間上的限制，政治權力下放必須急速進行。因爲港英政府在中國對香港政策還未發揮決定性影響之前，加速政制改革可確保英國在設計未來香港政治發展上採取主動。

在聯合聲名簽署的同年，港英政府開展了史無前例的政治開放。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香港政府宣佈代議政制加快進行，其精神體現在代議政府綠皮書內：主要是使立法議會加速民主化，使它將來成爲有實質政治權力的機關。代議政制發展是英政府在舊英殖民地非殖化時常用的手段。從邏輯上推斷，代議政制發展最終階段必然是一個有實權的獨立政府。但香港是不容獨立的，因此代議政制發展必然是充滿矛盾的。從中國的角度上看，代議政制發展必使香港在九七後變成有實質權力的政體，縱使名義上中國擁有香港主權。由於得不到中國支持，代議政制被迫煞車。

代議政制被迫煞車說出了任何政制發展必先得到中國肯首。在計劃政制轉變的過程中，不論本港政治活躍份子如何大吵大嚷地要求參政，他們在港自發行動的影響力，也只會是次要的。不幸地港英政府在政制發展上又再處於被動位置，這對港英政府在過渡期內管治更加艱難。（此點會在其他章節詳述，本文不加討論）

相對於英國，中國在香港問題上的觀點較之有連貫性，亦較易知其脈絡。中國在香港問題上的態度可以歸納成以下幾點：

(1)香港是中國主權不可分割一部份，任何獨立或半獨立行動絕不容許，從客觀環境上，香港是沒有獨立的可能性的。

(2)肯定香港在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上的角色及理解到大部份港人對中共心存恐懼。因此回歸後香港繼續保持資本主義（這是旨在經濟範圍上）是必須的。

(3)成功實行一國兩制對台灣起示範作用，在台灣回歸問題上有積極意義。

(4)保持香港經濟穩定發展比起任何政治改革更形重要。因此從中國層面上看，任何政制改革必須得到香港資本家支持。事實上，資本家的意見影響中國對香港問題態度的比重比起任何一社會階層，那怕是多麼龐大，都要重視。

(5)基於中方對第四點的重視，中國在制定對香港政策上其中最重要的考慮是保障第四點的實現。從這些原則我們不難推敲到中方對香港政治發展的態度：

(A)中方必定反對任何她認爲能引致對經濟發展的不穩定因素。例如：民主化過速、反對港英政府的越南船民政策、對擴大社會保障政策有所保留，等等。

(B)中國未必會主動幫助左派成爲一股龐大政治勢力。反觀由主要資本家組成的政治團體，例如：新香港聯盟、香港自由民主聯會，更受到中方的關照。

(C)對舊有的政治制度，亦即行政吸納政治的做法。中方認爲這舊有制度對香港穩定過渡有帮助，因此在政制改革上中方態度會是變得越小越好。

(D)對於在將來香港實行政黨政治，中方對此必持保留態度。

▲六四的啓示

六四後，中方不但不會認爲香港對政治冷漠有所改變，反而她會認爲香港人在政治上太幼稚、易於被人利用。因此中國在對港政策上大大收緊。例如：中方重新強調香港對中國大陸的威脅。所以政黨政治發展必更加困難，因爲在民主的政黨政治制度下，一個與中國敵對的政黨是有可能出現的。其次一個強大政黨在港成立，可能直接或間接地藉着示範效果，在中國境內製造「不適當」的政治期望。

對於具規模的政黨政治會否在香港出現，筆者抱不樂觀的態度。因爲，未來香港的政治架構未必能催生政黨政治。未來香港政制是決定於基本法，而中國在制定基本法時更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所以我們可以推斷到中國在制定基本法時必使九七後香港的政治制度難以發展眞正的政黨政治。行政長官與立法會成員會透過不同渠道選擧產生，行政首長擁有過大權力等，這等都對發展政黨政治做成額外障礙。

註一：展開中英談判，中方是有先決條件的。這就是英方要接受香港是中國主權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三、政治轉變中的香港政府

港府的自主性

(Autonomy) 從字面上的理解是自我管理自己而不受其他阻礙或干擾，它至少需要三項條件：(一)客觀環境上無任何阻礙及(二)有充足的選擇機會；(三)主觀內在意識上的淨化而不受任何情緒上及意志上的干擾。憑這三項條件去理解自主，可知自主的達至是受着外在及內在因素的影響：一個奴隸外在受制於主人而內在限於自身解放意識的不足。當我們從個體層面提昇到集體層面，一個地區或國家作爲他國的殖民地是永遠談不上自主的。香港，本作爲中國屬土而後淪爲英國的殖民地，根本從沒有過什麽自主可言，更不擁有自主的條件。奇怪的是，近年本港社會的輿論是要爭取高度自主權、港人治港等，自主一詞由此成爲了焦點關注所在。本文所要探討的不是爲這個現象作解釋，更不是潤論自主應有幾，而是簡述香港過渡期內自主的改變，而這一改變過程是，不論外在或內在的自主能力，都是朝着下方的走。

(二)External Autonomy

自一八四二年，香港開始成爲英國殖民地，外在自主權由受中國淸廷的控制轉爲受英國統理，一向以來，香港外在自主性嚴重受制於英國外交部，受着壓迫性的殖民地統治。維理(Peter-Wesley-Smith)的論文《香港歧視華人的立法》(Discriminatory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中淸楚指出很多殖民地統治的不公平對待。再看《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這兩篇憲法性的文件中，更能明瞭到理論上殖民地統治的壓迫性及剝削性。我們也許會認爲：雖然香港淪爲英國的殖民地，但英國却賦予香港相當的活動空間。不過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之所以不斷放寬對香港的統治並非基於惻隱之心，而是因應着戰後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及殖民地主義的衰落而作策略上的調整，香港受制於英國的本質並沒根本的變過。

過渡期的來臨，標誌着英國殖民地統治的淡化及中國接管的迫近，我們會發覺操縱香港命運的不但是英國，還多了一個中國，在現任主人及未來主人的討價還價之下，香港更是顯得孤立無援，外在自主性更形低降。要了解這一現象，可以從中國及英國的立場作起點。

英國的基本立場很簡單：在淡化殖民統治的過程中及以後，都保持英國的聲明及利益。二次大戰以來，民族主義的高漲迫使英國殖民地統治的崩潰，而她也作出相應的策略性措施，有步驟的非殖民化手段：協商性政府 (Consulative Government)、半代議制政府 (Semi-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代議政府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半責任政府 (Semi-responsisle Government)、責任政府／自治政府 (Responsisle Government)、獨立

(Independence)。而在這個過程中，培植親英勢力，使得獨立後仍保持英國利益。問題是，這一廂情願的政治邏輯却不可能在香港重覆，因爲英國要面對是未來香港的主人——中國的政治立場，這使事情更爲複雜。

中國對於收囘香港是志在必得的，部份是向台灣顯示一國兩制的可行性，而主要的更是實現祖國的統一；另一基本立場是，中國要保證接收香港後的可管治性。問題是，中國在達致基本立場之過程必定遇到以下的矛盾：㈠中國明白港人對中共的反感和恐懼，於是乎爲了順服港人便提出了「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政治口號。但是在作出保證之餘，又必須肯定以後對香港的可管治性，防止民主抗共、顚覆中共陰謀等。㈡爲了保證以後的可管性，中國尤其注意過渡期與九七年後各方面的衔接，希望與英方商談所有跨越九七的事務，但是，中國始終仍是未來的主人，現時她在香港事務的一舉一動，都會引起英國的不滿及港人的憂慮。

從以上中英對香港基本立場的分析，可以推理得到中英就對香港前途談過程中討價還價的表現，而夾縫在中英兩位主人中的香港更如木偶般受着中英兩面的操縱。這樣的結論也許是顯得悲觀，但自從中英聯合聲明的談判開始，的確有不少的事例可以得到引證：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聯合聲明簽定，但這關乎未來香港前途的協議並沒有港人參與討論，就連港人對此項協議的全民投票或否決權都被拒絕。自一九八四年初，英國向港人介紹了代議政制這一新名詞，展開了非殖化的步驟。從代議政制綠皮書中，帶出來未來香港政制的革命性改變，邁向着英式西敏寺的議會民主政治。但是，對於英國這項突襲，中國的反應是震驚和憤怒的。幾個月後，一些莫名奇妙的因素，英國在政制改革上突然作出了改變，從白皮書看出，改革的步伐是明顯的倒退，這也是英國以往非殖化政策所罕見的。自從白皮書公佈後，中國已採取了行動去奪取政改的主動權，一方面強調未爲中國認可的政改將被視爲違反聯合聲明的精神；另一方面，立即進行草擬基本法，爲未來對香港的統治作出初步藍圖。在起草基本法的過程及安排，更是明顯得看得到中國「主人的本性」。簡單說，在過渡期內香港面對着中英「雙重權威下」，無論是政制改革，大型建設、國際關係等各方面都受制着，並無什麽外在自主性可言。

說過外在自主性後，要探討的是內在的自主性。內在自主性簡意是指在對外受制於他國，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管理當地本土的一切事務，所以內在自主性的先決條件是政府是否有足夠法理地位、資源、能力等去行使獨立自主權而不受本土內各種階級、宗教、種族等的干擾。由於香港並沒有嚴重的宗教和種族的衝突，我們會理解的內在自主性是香港政府是否有能力去奴駕資本主義內在的階級分歧，維持資本主義秩序的完整性。諾德林格（Nordlinger ）曾扼要說明：「在資產階級的內部，有着對來自下層的情緒的嚴重性的不同認識，與及來自下層的威脅對於不同的資本單位及部門所做成衝擊的程度的不同評估……，因而國家組織的自主性是必要的。」

認識了內在自主性的意思後，以香港實際的情況，我們可以在八十年代以前的港府一直都保持着相當的內在自主性。從《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兩份憲法性文件，可以看得到一個典型的殖民地政府！港督擁有近乎專權的權力、封閉的政治参與渠道、專權的法例等。除了殖民地統治這一因素外，造成了港府的內在自主性還有香港人的心態：政治冷感、甘願受殖民政府統治、熱心於經濟機會而不在政治機會等。雖然這些形容港人心態的評語在程度上值得商榷，但現實的是港人並不願意投入推翻「開明專制」的殖民地統治，回歸赤化了的祖國。憑着這兩因素，殖民地統治及港人心態，形成了港府相當的內在自主性。

隨着外在自主性的改變，在八十年代港府的內在自主性也向着下降的趨勢。要了解這一情況，可以從維持港府內在自主性的因素作起點。首先，封閉的政治參與渠道自八十年代開始日益被受挑戰，議會政治的邁向，刺激了港人更大的政治要求，港人除了在爭取經濟機會之餘而爭取政治參與，更重要的是明白到香港前途的問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重要性。此外，面對着香港未來的主人——中國，港府在施政上，例如剛才舉例的政治改革，多少是受到了其他考慮因素的限制，以致本身在過渡期內認受性（ Legitimacy ）的衝擊。在這兩項新發展下，香港的新風景是：㈠殖民地統治的日益淡化及權威上的衝擊；㈡越多港人開始投入社會，關心香港，提出更多的政治要求及批評，挑戰政府之權威性。在這樣的情況下，港府在香港的統治權力自然下降。可以預料的是：在過渡期內隨着政治要求的日益增加而政府却沒有相應的政治改革作吸納。由此而出現的權威性危機必會不斷衝擊着港府的內在自主性。

簡述過港府在過渡期內對外及對內自主性的轉變，得出的結論是它們不斷的下降。這樣情況的出現，深切地影響着港人的命運，自然也成爲近來公衆關注的命題。筆者認爲，要對香港自主性能力作出回應，需要從幾方面着手：㈠政府必需作出相應的政治改革以適應現時香港政治新風景，減少權威性的衝擊；㈡加強市民的民主意識，爲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些空泛的政治口號作出實質支持；㈢加強與中國的雙方了解和合作，減低將來中國對香港的控制至最低點。

公務員的角色

香港的公務員系統與西方的傳統官僚系統在角色上有頗大的分別。他們既是決策者、法律制定者，又是政策執行者及法律執行者。而這些角色主要是由公務員體系中的高級公務員，即政務官員及高級專業官僚，所擔任的這種文官／政客的角色重疊正是香港的殖民地式統治的特質。而整個官僚角色的安排，基本的目的是用以解決殖民地式統治所遇到的問題——政府的認受性及社會的穩定。

▲公務員傳統的角色

整個公務員系統享有非常高的自主性；這自主性主要在以下幾方面體現：㈠雖然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但她自戰後甚小受到來自上層的干預。可以說，她在社會各方面的政策，除國防外交事務外，擁有高度自主的決策權。㈡官僚系統本身在意識形態上及政治上是中立。她並不偏袒或維護社會任何一個利益集團或階層。政策在經濟政策上一向維持積極不干預的宗旨，容許各種工業，商業活動自由地發展。㈢政治體制中並沒有任何建制內確立的監察及制衡渠道使官僚對市民負責。立法局的基本角色只是諮詢及民意表達，對政府並沒有產生制衡作用。政府的監察及制衡只是由於本身的自發性約束。其實官僚的行政自主性對香港的政治穩定是異常重要的。因爲香港社會無論在文化上或在意識形態上是非常多樣化的，因而潛在着各種各樣的矛盾。而高度的行政自主性正好賦予官僚足夠能力作爲中介者、調停者及訟裁者，以解決任何矛盾表面化。

與其他殖民地一樣，香港政府同樣面對着政府認受性的問題。如果認受性可以理解爲群衆認可香港政府的統治的話，那麽官僚系統所實行的政策在某程度可以解決認受性這個問題。一直以來，政府實行着所謂的「行政吸納政治」，即在政府制定政策過程中，把社會上的精英吸納入過程之內（如委進政府各部門的諮詢委員會及行政立法兩局內），以增加社會對政策的支持及認受性。另方面，在政策制定過程，官僚盡量利用各諮詢渠道，收集群衆的意見。雖然這些意見在決策過程中未必受到重視，但這種諮詢政策却有着重要的象徵意義，它顯示着在定立各項社會政策時，政府必然聽取各方意見。而官僚的行政政治自主性同樣地可以加強政府在資源分配的合法性。

基於香港社會文化的特性，群衆普遍是政治冷感，加上制度上的規範，社會上並沒有強大的政黨。而建制內各級議會除市政局擁有部份市政權力外，區議會及立法局本身只是諮詢機構，並沒有實質權力。在這種結構下，社會上所謂的政客就算能晉身立法局成爲民選議員，根本沒有能力挑戰官僚系統。政策制定的權力仍落在行政精英手上。因此可以說，政治權力基本上是集中於官僚系統。

而這就產生惡性循環，加強香港社會非政治化的程度。加上官僚本身在決策過程往往將一些資源分配或利益衝突的問題，向大衆傳識爲行政問題，並以行政手段使之解決。這種政治行政化的政策，又加強香港社會非政治化的程度。其結果就是，社會得到穩定，群衆視官僚爲公共利益的監護者，在社會資源分配問題向其表達

意見，而非依賴社會上的所謂政客以政治手段解決問題。另方面，因爲政府成功地把那些政客排除於決策過程外，使到官僚擁有高度自主性制定政策，以符合理性的客觀社會結構性規限，及維護社會整體利益。

▲公務員角色的衝擊

根本上，政府在社會上的種種活動離不開資源分配的規範，而這種種又涉及群衆的利益，因此形成群衆對政治參與的客觀需要。加上隨着八十年代香港經濟飛躍發展，社會日趨複雜，商業活動日益頻繁，形成種種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而這又形成行政政治化的反趨向。另方面，由於資源分配的權力集中於官僚系統中，因此整個政治爭鬥的遊戲便規範在官僚系統這個範圍內。不幸的是官僚本身有着先天性的缺撼——缺乏合法性，而它又不能以政治動員來支持其政策，這就產生官僚系統的政治超重的問題。

隨着八十年代初代議政制的發展及中國對港人治港的承諾，社會上催生很多的政治團體及政客。而各級議會的開放又容許越來越多的民選議員。這就產生以下的問題：由於香港地方細小，議員往往把地方行政問題提升到政府全港性政策的層面上。再者民選議員建政位置是在諮詢組織內，並沒有資源及能力去攏絡選民。他們只好向官僚系統提出超乎現實的政策建議及不負責地攻擊行政精英所制定的政策，以贏取選民的印象分。這種情況隨之而來的結果便是官僚的士氣受到影響。行政精英們由於擁有最充足的資料，他們往往認爲議員是門外漢，所出的建議根本是不夠專業及超於現實。再者他們以爲民選議員把他們作爲不能兌現選擧承諾的擋箭牌。這種種都足以嚴重地打擊公務員的士氣。

另方面，政制將依照基本法所規定的發展，產生越來越多的民選議員，甚至是專業政客。自然地，官僚原本的政客／文官雙重角色便會產生混淆。這混淆又未能在憲到上得到澄清。另一個問題是，各級議員普遍認爲公務員需要對其負責，而制度上又不容許政黨主政成爲政府的可能性。這就產生公務員產生所認知的負責對象的混亂問題。

▲公務員未來的角色

其實探討公務員未來的角色這個問題，基本上是回應以下的幾個社會及政治制度的發展：社會及經濟發展日趨複雜，英國即將撤出香港政治權力中心，香港主權回歸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即將取代殖民地政府。

從中國在公務員系統的問題上的積極合作態度及在基本法的政治制度安排上來看，中國有意識地把整個行政主導的模式延續至特區政府。因此基本上官僚系統將會繼續擁有決策權，訟裁者的角色將會維持。不過隨着香港的政治團體無論在數目上或組織規模上進一步發展，官僚系統將會受到它們越來越大的挑戰，而這種挑戰分別在建制內及建制外進行。這個情況又會嚴重影響官僚系統的自主性。不幸的是，隨着經濟的飛躍發展，社會利益關係日趨複雜，官僚系統的自主性比以前任何一個時期更形重要。諷刺地，社會極需要官僚系統的自主性同時，它反而被削弱；隨之而來的後果便是官僚系統的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問題。不過在政治制度上，並沒有

提供有效的機制以解決上述問題。總之官僚作爲公共利益的監護人，訟裁者的角色將會因自主性下降而產生合法性的問題。

政黨與政治團體的發展所帶來另一面影響，是會在某程度上爲社會政治運作中，充當政客的角色。不過基於制度上局限，政治團體並不可能成爲執政黨擬定政府政策。它們只能在建制內（主要通過一些諮詢委員會盡量爭取官僚吸納它們的建議），及建制外（一些行動性的表達方式如遊行）影響官僚系統的決策。因此，可以說政治團體只能在整個權力分佈中拾獲一些權力的零碎。政客的角色在只擁有零碎的權力這個情況下作有限度地發揮。官僚將會仍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表演者。「官僚從政」這個歷史事實將會得到維持。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官僚與政治團體的關係是共生性的，特別是在未來香港的情況；官僚可透過吸納某些較爲有組織、有較多會員的或較能充分反映和代表大多數群衆利益的政治團體的建議，來增加其合法性。官僚制定政策的合法性問題，可以在有限情度得到解決。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行政輔助組織的出現。透過這種安排前途的政治超重問題將會得到舒緩；再次加強政治行政化將會使官僚系統所承受的政治壓力減少。

四、香港社會——一個階級分析

在政治分析上，「國家——社會」的二分法是常用的分析架構。在國家的層面上，我們分析政府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對政治發展的影響，憲政制度及政治結構的轉變、具體的政治人物及政治團體的活動及策略。但一旦我們脫離對社會的分析時，這些分析便不完滿。縱使國家及政府相對於社會有較大的權力，但無論是政制發展到政治團體發展以至具體的政策的推行，都是需要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的支持，而國家及政府的行動也離不開對社會形勢的估量。

然而在香港政治的研究及討論上，對香港社會的分析不是忽略了就是處理得過分簡單。這些少數的香港社會分析大多把香港社會視爲一個同質體，香港人多數都是經濟動物，對政治冷感，滿足於現況及港府表現。香港社會被描述成相同性大於異質性，社會不平等的事實也被掩藏。

把階級分析引入政治分析就是要把社會不平等的事實突顯出來。這種做法有兩個作用，一個是分析性，另一個是策略性的。在分析上階級分析把在社會上佔不同位置的人的處境（經濟、政治及社會條件）、利益、政治及社會傾向、可動員性及動員模式作一系統性的舖陳，並解釋它們與具體的政治現象如政治改革，政治團體發展及政府政策的動態關係。在策略上，階級分析揭示了社會不平等的情況，並把不同階層的人的生活情況，取向及可動員性列舉出來，供我們以作政治活動的方向及策略的參考。

在這一章中，我們先簡介香港在八十年代以後的政治及經濟情況，作爲以後分析的歷史背景。而在香港的階級分析，我們將採取傳統的三分法，即資本家、工人階級及中產階級。對於每一階級我們都會分析其經濟及政治的處境，對社會、政治以至香港前途的取向、社會網絡、及其與政治或壓力團體的關係與可動員性。限於目前有關香港的階級或社會分層研究的缺乏，我們的分析或會流於印象性，需要日後研究的補充或修正，但這畢竟提供了一個較適當的觀點去討論香港政治。

香港分析

在八十年代，香港踏進了一個爭議性的年份。在政治、經濟及社會上都有許多的轉變，而這些改變，有些更影響香港現存的社會結構，令到許多政治、經濟集團對香港的態度改變。因此，在分析香港現在的階級之前，我們對香港現況作一個簡略之分析。

在政治上，香港的前途問題，隨着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之擬成，已得到一個概括之勾劃。爲了配合未來特區政府之銜接，九十年代的香港政府，亦將會作結構性的改變。九一年的三級議會選舉，正是未來政治風景的里程碑。各個政治勢力，隨着選舉的來臨，開始作出種種的步署，拉攏有關的階級基層市民，作爲其支持者。這可會意味着在九十年代，階級的利益鬥爭將會明顯化嗎？

九七將至，中英雙方面亦開始加強、或撤退其本身的勢力，目的當然爲日後鞏固自己的利益。中方除了加強對香港方面之言論外，還支持工聯會及其它親中團體，以求在立法局及其他基層上確立自己的實力。而英方爲了光榮撤退，亦開始了其策略性之步署。在人材方面，英方開始加強培養及重用華人高級公務員，以求在日後接力，在政治團體上，則未見英方明顯偏帮任何一方。反之，她在法律上進行了一些改動，例如草擬人權宣言；此亦可算爲保障香港人權作了一些努力。

另一方面，隨着香港前途開始明朗，香港公務員的地位日益重要，未來公務員必會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最近公務員運動加劇，這又意味着這一群公務員會加強其內聚力，形成另一新勢力。

隨着八十年代的發展，香港成爲亞洲四小龍之一，其經濟的發展，已爲其他各國所注視。這亦加強香港在協助中國四化的地位。然而，香港的經濟結構亦進入一個調整期。香港的服務工人大幅度增加，而且起義了生產業工人。這表示香港經濟由生產轉變爲服務行業主導。服務業的擴大，意味着傳統的階級結構會更趨複雜，工人階級再不只是工廠工人，它包含了其它服務行業，甚至是白領階層的基層從業員。所以我們應留意其內部結構，及其他政治團體如何動員他們或代表他們。

在生產業方面，香港的生產模式亦進行改變。因爲香港不能再以「價廉物美」去作其基本之競爭條件。香港工業實需要引進高科技，以出高質素之貨物爲主，此才能在強烈競爭中找到出路。再加上香港商人將部份的工序移入內地工場，令到原有之勞動人口結構有所改變。在未來幾年，會出現一大批結構性失業的工人。

另一方面，根據港府未來的計劃，香港將進行大規模之玫瑰園計劃。屆時大量的政府資源將集中在道路之興建，機場之建設。反之，一些基本的社會福利則會相對地被忽視了。再加上醫管局之設立、房屋處之自負盈虧，這些都打擊到低下階層之利益。稅制不變，反之加強其他之間接稅，令原有之財富不均之問題加劇。香港之貧富懸殊日益嚴重，階級間的矛盾亦必會日益嚴重。

九七將至，投資者的信心亦將會影響到香港經濟發展。除了中資機構加強在香港之投資外，大部份的外地及香港投資者都採取了一個觀望之態度。他們只對中、短期的投資感到興趣。這態度，對於正步進結構轉變期的香港是十分不利的。更甚者，英資的怡和、及滙豐之遷冊，更打擊到投資者對香港經濟之信心。

基於過往經濟發展蓬勃，香港的失業率偏低，香港市民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此令香港市民對於現存政府及經濟模式都感到滿意；再加上傳統的殖民地統治，市民們都習慣處於政治冷漠、帶有傳統、保守及怯懦的心理。在生活中亦滿足於消費、及流行文化之潮流。除了小數之聲音外，反叛的意識並不主導。

在中上層階級中，移民則成爲其熱門話題，他們不少人帶着過客心態；面對將來，他們許多採取了積極（移民）不理會之態度。至於香港的低

下階層，因爲走不了，唯有抱着一種「既來之，則安之」之態度。此亦造成了上下層市民心態之分歧。

在八九的「六四」事件，可算是香港未來的發展的一個轉捩點。中國政府之殘酷行爲打擊了香港人對中國之信心。信心的問題日趨嚴重。

政治上，「六四」事件，令到傳統冷漠之香港人大舉上街，亦加強了政治領袖及市民相信香港要加速民主化的逼切感。而對於中國之態度，亦成爲了未來政治領袖必須處理之問題。「六四」事件亦造就了民主派之領袖，李柱銘、楊森、司徒華等，在六四後建立起他們之聲名及影響力。

在經濟上，香港則繼續出現了二次負增長。外國對中國之制裁，對香港經濟亦造成打擊。然而，受到制裁下，中國經濟仍然得支持，其「韌力」亦不可忽視。但總之，香港經濟需要幾年時間去調節。

在民心方面，筆者則將之分爲三類反應去討論。第一，「六四」事件後，香港出現了大量的移民潮，而英方亦提出了「居英權」方案，這些均都令抱着過客心態者，提早離開。第二種反應則是部份市民感到無力感。二次百萬人的遊行並不動搖中共之決定。這群消極的市民，抱着「逆來順受」，一切以「不變爲最好」的原則去觀望未來的發展。又或者，他們有些則對未來失去信心，故轉移過中方，祈求安穩。第三類反應則是，香港部份的居民，爲了保障自由和民主，故支持一些政治組織，他們積極爭取，希望爲未來香港、及中國盡每一分力。

在這個錯綜複雜的環境下，我們再更深層到分析其內部階級之矛盾，找出未來政治之動向。

資本家——既得利益獲保證

香港的財富集中程度一向都十分高，故此大資本家基本上控制了香港的經濟命脈。他們在香港的投資，亦可算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

基於他們擁有極大的經濟權力，他們在政治上亦有巨大的影響力。傳統上資本家的代表在立法行政兩局內均佔多數的議席，他們的意見或利益也在政府中受額外的重視。另外，不論中國政府或英國也格外重視資本家的利益和意見，這一點我們可從他們在基本法草委及諮委所佔的席位與及他們組團上京或到倫敦訪問的官方反應中得到印證。

資本家對政治的最主要要求是要政府爲資本累積製造有利的條件。但在轉變的經濟環境及九七回歸的震盪下，資本家內對如何維持有利的資本累積條件產生了不同的認識，因而有不同的政治反應。

第一種是非政治化的反應。部份中小資本家對香港前途抱較悲觀態度，害怕九七後政治動盪會影響到自己的利益，於是便移民外國，找太平門。他們仍希望以香港爲業務基地，借中港關係或香港本身的條件謀利，然而其非政治化的態度令他們不踏足於政治舞台。

而在資本家中最主導的反應是要維持他們眼中的香港「成功方程式」不變：偏帮資本家利益的政治制度加所謂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所以在他們眼中最好的選擇就是只把香港的宗主國名由英國換成爲中國。然而從港英政府推出代議政制改革到聯合聲明中

規定未來特區行政首長及立法機關必須由選舉產生都表示香港的政治制度一定要作出改革。新的遊戲規則——基本法的制定加上民主運動的壓力令資產階級在八十年代出現了大規模動員。一方面或明或暗她和中英雙方斟旋，另一方面又自我組織起來，透過像基本法諮委的八十九人團和新香港聯盟與傳統的工商組織如中華廠商會和總商會來向中港政府施壓。資產階級內部的小社交圈子和商業圈中千絲萬縷的關係令他們享有高動員性，而他們所掌握的經濟則確保他們得到最後的勝利。結果，政制改革被推遲，而在基本法內規定，未來特區行政長官由大選舉團選出，立法機關成員則分別由大選舉團、功能組別及全民投票選出，這種政治制度確保資本家有足夠能力操縱未來特區的權力中心。此外，一些重要政策原則如政府要保持低稅率及量入爲出的財政政策等寫入基本法中更把資本家心目中的政治藍圖憲制化。

部份資本家却持另一種態度。他們認爲香港的繁榮前景有賴於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英國撤離主權所留下來的權力眞空需要由一個本土的民主政府所填補，此擧不但有助防範中國干預而來的干預投資環境，亦能使香港政府的認受性增加，以吸納中下階層的政治不滿。持這種態度的多屬於本土較年青一代的資本家或有外資背景的資本家，如李鵬飛、麥理覺等。然而在保守的政治霸權底下，他們並不能爭取較大的政治空間。今年麥理覺再不被總商會支持競選立法局，原因是他「太激進」，在八五年大談組「才俊黨」的李鵬飛也在「本子風波」後沉靜下來。

事實上，如上文所述，資本家所渴望維持的，是一個能保持他們既得利益的政制及政策，而基本法對政制及政策的設計基本上符合他們的利益。故此資本家在未來將會維持其一向採用的政治參與模式，透過建制（如大選擧團、功能組別、各種政策委員會）和私人接觸，甚至透過中國來影響政府決定。緩慢的政制改革將令資本家有足夠時間去準備找代理人去代替他們參政。故此，一些由資本家和中產階級所組成的政治團體或政策研究中心，如新香港聯盟、自由民主聯會、香港基金等紛紛出現，以「跨階級」和維持「整體利益」的名義來推出候選人參與各級議會選舉，研究政策及發表言論來作政治影響。但基於他們的群衆基礎實在太薄弱，故此成績實是強差人意。但無論如何，在短期內政制的設計已足以令他們在香港政治上有最大的影響力。

工人階級——擴大但待組織

在傳統的階級分析裏，工人階級是指那些在工廠裏的生產工人。但隨着職業結構日益複雜，製造業工人佔勞動人口的比例日益減少，工人階級的意義有擴張的必要。事實上，部份白領僱員和服務性行業從業員無論在薪酬、福利、工作的重覆性、對工作的控制、消費和社會地位都和工廠工人相差無幾，故此他們會否連結成爲一股，所謂「基層」的政治力量，將對未來香港政治有重大影響。在這節中我們將這個廣義的工人階級的成份：工廠工人及小白領階層作出分析。

▲工人

工人在生產的過程中，他們所扮演的只是一個機械性程序的其中一部份，從組織活動（ORGANIZAT-IONAL BHAVIOUR）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工作技術低，在生產的過程中角色並不重要，而且亦因大量生產及分工，他們對於他們所造的工序，甚至缺乏認知。他們爲工具理性所主宰。而資本家強調的亦只是形式理性已矣，盲目地追求生產率（Productivity）及效率（Efficiency），這造成了工人們的勞動生產，出現了異化的現象。他們本身對工作的滿足感低，而却因爲要賺取金錢謀生，因此仍埋頭苦幹。

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們所得的薪酬却只得三、四千元。而且，工作環境及福利亦不能與白領工人看齊。因此，我們可推斷資本家在一定程度上，對他們進行剝削，及賺取他們的剩餘價值。更甚者，在香港這個社會發達，而且號稱文明的社會中，工人的基本權益亦能受到法律的保障。在這個角度裏，沒有不合理解僱條例、中央公積金等工人的基本保障。而且，他們的薪酬加幅亦往往追不上通脹率，這無形中令他們蒙受損失。再者，爲了迎合政府之玫瑰園計劃及壓抑通脹，港督更呼籲僱主調較薪酬，應配合政府策略，不應盲目調整。反而，並不見港督提出，一些大機構不應硬要維持一定之利潤（PROFIT），而不斷加價。

再者，一如上文所提，香港正進入轉形期，但是却面對着信心問題，令許多工場內遷至中國。這做成一些結構性的失業。而且亦因面對鄰國之競爭，如香港工商業不能克服信心及調整之問題，香港工商業將受到打擊，屆時，工人必然會受到波及。而政府輸入外地勞工，亦間接地令香港工人的薪金不能合理地上調。綜合而言，我們發覺香港的工人階級，確實受到剝削。

政治方面，在傳統的殖民地政府裏，工人的角色一直不受重視，而他們本身亦不見積極。工人參與政治，往往是透過工會的形式來表達其政見。然而，工會本身却也自我對立。香港工人階級的工會，大致可分爲左、右、及一些獨立工會。親中的工聯會是左派的代表，而右派亦以工團會爲代表。而工聯、及工團會更在立法會中各佔一席位。但這又是否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受到重視呢？其實，我們可以從香港政府強調量入爲出的政策中能找出一些瞄頭。香港政府強調公共開支不能超越通脹率，然而這個方針又是否合理呢？爲什麽公共開支之增長，並不是按照實際的需要，而是跟着通脹率而行呢？而香港的公共開支亦只佔全個政府財政預算的一小部份，且常受一些講者如楊森等之批評。我們從這些例子，可看到工人的利益是受到忽視的。

雖然，工聯會有約十七萬的會員，而工團會亦有二萬多會衆；而中立工會則約有十五萬多會衆，三個不同的派系互相分裂，這對於動員爭取工人利益，則甚爲不利。更甚者，在這三個派系下的工會中有百分之八十九的工會，其成員只有二百五十——一千人等。而工會往往却只爲了要求破產賠償等，才發起動員。這樣，令到工人行動流於散亂，缺乏統一的目標及長遠的方針。此外，以事件爲動員的依歸，亦會削弱工人對工會之歸屬

感。

但更重要的，三個工會勢力中，其中工聯會及工團會之組成，實乃受到中、台兩方的政治勢力所影響。這無疑令到工會之性質異化，由一個自發而成，爲工人爭取及保障權益的組織，變成一個受到支配，有確定之利益（中、台兩方）之組織。這令到工人運動受到一定程度之打擊，而且亦缺乏生氣和靈活性。因此，要看工人在日後政治風景之角色，我們應留意日後獨立工會的發展。

此外，香港工會比較少用一些激進的行動，如絕食及示威之形式去表達其意識。因爲工人的知識水平比較低，故比較少受到西方自由、民主及人權的眞正衝擊，他們比較傾向於傳統的儒家保守思想，對於激進的行動，仍採取保守之態度。

過往，這群工人大部份是中國移民，而香港只是過客之地。今日，儘管在香港已生了根。然而，經過了多年，殖民地政府之統治，他們生活安定，且得安飽，對於政治，他們仍比較冷感。儘管九七將至，他們亦開始留心政治。但是要在這短短的十數年間，由政治冷感轉化爲積極參與，此實是不可能。他們的參與，亦只流於關注的層面，對於政治團體，他們亦感到陌生（因爲最近才有類似政黨政治團體）。他們接觸、參與政治，亦只有透過閱讀、投票選議員及參與工會。而投票選區議員，這無擬給予他們參與政治之經驗，但是他們投票之基礎，往往只是因爲受到當地社區組織之影響，缺乏進一步之認知，而參與工會方面，我們亦發覺，工會往往要用康樂設施、福利及旅行等去吸納之。在工會內，亦鮮見有對政治及經濟等之深入研討及講解，此令他們對政治的認識有限。

香港市民亦比較相信階級流動性之說，他們相信，只要勤力、奮鬥，他們亦能有出頭之他。因此，他們本身對於「受剝削」之概念甚感模糊。然而，對於工人之子弟來說，教育可算是爬昇階級的最佳手段。但現實上，因爲家庭、資源及入讀的學校，他們晉昇之機會，或多或少亦受到阻礙。而處身於工人的他們，上昇之機會却甚少，除了小數的職業流動外，他們只能自己累積資本作投資，此方可有爬昇之機會。他們往往無什麽政治抱負，建立烏托邦，還不如給他們多點薪酬來得實際。短線利益，可能就是一般工人所要求的東西。

在未來的發展中，儘管有直選，工人因缺乏資本，因此參選之機會亦比較少，而參選之工聯會，却又因爲受到中方之影響，及減低了其代表性。大選舉團中，中方兄強調重視工商界之意見，但並無提及工人之參與。即使有，如果是工聯或工團會的話，那亦是徒然。因此我們可推斷，在未來的政制中，工人之利益仍受到忽視。

可是，政黨的出現，及加強民主化之步伐，亦能政治團體會互相辯論政策，又或會到基層去拉攏工人之支持，工人將會得到更多的政治教育。而工人的政治文化，亦可能從而培育出來。但是，在現存的政黨中，大多是工商或跨階層的，至於工聯會亦因爲「六四之事件」後，香港人對中國採取懼而遠之之態度，因此，我們可說，將來的政治團體大多數並不能眞正反映工人之利益。而隨着政治意識日重，獨立工會和「民主派」的政治團體可能會擔當一個新的角色。

在經濟方面，工人們本身處於一個受剝削的階級；然而，在未來的幾年中，我們看不見政府會重視他們。相反，爲了機建，他們的工資亦受到抑壓。而步進九七——信心之危機（投資者），及經濟結構之轉盈期，如果這二個難關，不能好好的配合，香港之經濟亦將受到打擊，但香港的工人，在這動盪之時刻，他們將受害至甚。因此，未來的工運，有着不可評估之潛力。而且有可能激化爲階級之抗衡。

但，工會受到香港工業之影響（因大多是中、小型之工場），再加上，工人的利益亦流於短綫，及在傳統意識之影響下，令他們將注意力集中於家庭；而工會亦互相對立，甚小聯合行動；在這個環境下，工人們現在很難發展其本身之階級意識。而反而受到主流之普及文化，消費主義及傳播所影響，比較安於現況。

但九七將至，他們將要面對轉接期，承受着衝擊。而且加上政治意識及教化日強，面對着被受剝削，面對着他們不願見的中共，承擔着日後香港發展之支柱，工人無疑會發展到其本身之意識，這只是時間的問題。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工人們將會在日後的政治風景，扮演着一個承擔，及支持者之角色。雖然角色仍是被動，但是今次他們因爲無特別的政治興趣，只是希望與中國及香港之發展着想，這個直率之態度，可能是日後發展，或變革之方向。

▲小白領

近五十年間，香港的工業轉變甚速，在一九六一——六八年間，文員的人數有顯著的增加，而增幅達四百五十三•七個百分比，女性僱員佔總文員增長的一個重要部份。再加上統計資料，文員與生產勞工在收入上的距離，有縮減的現象。一九七六年文員與生產勞工的中位收入的比例爲一點四，而在八一年時，則已縮減爲一點二。換言之，以收入而言，文員與生產勞工之間的距離已逐漸拉近。從以上的資料，我們可以歸納爲三個大問題，小白領的地位日益重要，那究竟在未來政治上將扮演着一個什麽角色呢？此外，小白領與生產勞工之分歧日益減少，那小白領會否追隨着勞工階級本身之階級運動呢？如果不會，那又將會是什麽形式呢？

要解答以上三個問題，我們先從小白領本身內部之結構着手。在辦公室內的分工組織工作的程序都比較個人化。其工作的運作亦依賴整個結構之配合，特別是配合上司之要求、再加上辦公室本身之客觀條件，形成他們之間的關係比較親密，而且在公餘時，亦會與上司有交際式的活動，或者我們可稱之爲無酬的加班。

對於小白領來說，他們本身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行業，及不同的職級，都代表着不同的身份及名利。在同一公司內，有信差、文員、秘書及會計等等，這與生產勞工有着顯著的分別。而且基於有不同的「身份」，小白領在勞資關係上所追求的，不單單是薪酬之調節，而且是「身份」上之提昇，但基於客觀環境上之限制，小白領不可能依賴工會，而要求公司給予集體的昇職。於是乎，對於小白領來說，他們所追求

的進昇階梯是個人之努力。

此外，文員對於職級或「身份」之分類，有着高度的自覺，根據另六宗的文員個案研究可發現。他們在介紹工作性質時，經常與其他相近的工作崗位劃淸界線。所以，基於同一職業類別內，亦有複雜的分化現象，因此文員間要發展出以職業爲基礎；而同時又擁有着同一身份的工會，殊非易事。

然而，我們也不可忽視文員在工作上遇到的問題；例如薪酬偏低、缺乏升職機會都會造成不滿的情緒，提供發展組織的條件。我們會發現，根據86年的調査，文員的58.6% 爲女性。換言之，文員是一個比例較高的職業類別。以目前香港的情況而言，女性勞工參與工會的傾向較弱（1986年工會會員性別比例，男比女爲100：31.5；而女性勞工參與工會的百分率爲8.9%）。由於現存性別分工之制度，女性勞工通常要扮演家庭主婦與出外工作的女性的雙重角色，而在參與工作過程中，亦往往因生育及家庭的需要而要間斷工作。這些情況對女性「白領僱員」參與工會產生一定的阻力，而女性勞工參與偏低又再影響到「白領工會」的發展。

此外，工會本身之主動性亦妨礙了小白領之工會運動。根據中區文員調査資料顯示不少文員均自覺與一般「藍領工人」有分別，並以腦力／體力勞動來界定「白領」與「藍領」不同之處。換句話說，文員本身相當着重白領與藍領之差別。於是乎，他們本身對於藍領工人的集體抗爭運動，，有着一定之保留。

綜合以上之論述，我們可發覺，小白領之文員基於結構上及意識上之問題，儘管他們實質上，小白領與藍領工人之分別日益減少，然而，小白領將不會追隨着藍領之工會運動。

然而這只是以工作的層面而論的。在消費的層面上來看，小白領和工人的薪酬相差無幾，故在消費模式、生活模式、居住環境等經濟及文化狀況並不和工人有重大差異。故此縱使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流動模式大不相同，他們之間的差異仍可被「打工仔」和「基層」等身份所包含。所以雖然他們在工運上的動員程度會有所不同，但在政治的層面上，他們仍可被基層組織或基層取向的政治團體連結成一股以人數取勝的政治力量。

中產階級——動員兩極化與社運傳承

中產階級一直都是階級分析中最具爭議性的課題。中產階級隊伍在香港興起固然是由香港戰後經濟發展所帶導，然而其政治取向却是衆說紛紜。本地學者及社會運動家如張炳良，Ian Scott 及楊森等認爲香港的中產階級是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作爲新興的社會力量，受過高度教育，社會意識較高的一群，香港的中產階級對封閉的殖民地政治制度的不滿促使他們成爲民主運動的中流砥柱。相反地，劉兆佳却認爲參與民主運動的人只佔中產階級的小數，大部分香港中產階級人士均依賴既定的經濟政治制度謀取階級流動，故其政治傾向均較保守及有較強的個人主義傾向。要在這紛紜的論述中爲香港中產階級「定性」，我們便需要分析其內部構成、利益及階級流動經驗的差異以推論其動員條件及基礎與及考慮歷史性因素如香港政府之政治吸納模式及社會發展，從中爲中產階級政治得到一些提示。

從香港中產階級的內部構成的複雜性來看，要動員他們成爲一股統一的政治力量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在工作的層面看，中產階層的利益關係隨着其工作的行業、職位、甚至是所屬公司的不同而改變。再加上中產階級所擁有的經驗或專業知識令他們傾向用較個人化的方法，而不是集體行動去獲得流動機會。所以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不同，工作及市場條件並不是重要的動員基礎，更加不是統一動員的基礎。而從社會流動經驗來說，中產階級的內在差異性也很大。差不多一半的香港中產階級是藉學歷而獲得社會流動的，而另外一半的則是藉工作表現及經驗而獲得爬升機會。社會流動途徑的不同意味着他們的文化教育背景比較多元化，而這又反過來削弱中產階級以共同教育背景而形成階級認同和文化的可能性。

雖然工作條件並不是中產階級的主要動員基礎，但這並不妨礙集體消費作爲他們的動員基礎。教育、環境、文化、房屋以及稅制等都是可能的共同動員基礎。而中產階級的內部差異性也不是無跡可尋。其實我們大可把中產階級分爲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兩大類。前者是指諸如醫療、教育、社會工作等與政府公共政策關係重大的行業，後者則是指和私營機構有較大關係的管理階層及有關專業，如會計及金融業等。屬於前者的中產階級成員由於其物質利益以至專業理想的實踐均和政府政策掛鈎，故此他們較傾向民主化。相反後者的利益是和私人機構掛鈎，因而有較保守的傾向。

而這種二分的動員傾向也在近年的具體政治行爲上可看到。一方面我們可看到部分傳統中產階級專業人士被吸納入政府的諮詢架構，如被委任入行政局、立法局或諮詢委員會，或從功能團體選舉途徑入立法局。這些利益及政治傾向和資本家較接近的中產階級成員亦和資本家組成政治聯盟，如自民聯、新香港聯盟、八十九人方案等，爲資本家做其政治代理人。另一方面新興或知識份子意味較重的中產階級又與基層社運及九七回歸及政制改革所引來的民主運動連結起來，成爲現在的「民主派」，更藉港同盟的成立向政黨化的道路發展。其實兩者都是七十年代政治參與模式的延續，前者是「行政吸納政治」的延續，而後者則是七十年代興起的社會傳承。

然而香港中產階級政治的兩條方向發展至今都遇到同一問題——整體代表性不足。對於「行政吸納」一脈的發展，這可能不是一個問題。因爲這些中產階級加入這些吸納機制的目的並不在於爲群衆作政治爭取，而是鞏固自身的旣得利益，故此大選舉團，委任制度和功能組別的代表性不足對他們來說並不是大問題，充其量也只構成政策的認受性困難。然而對於走群衆社運動線的中產階級來說，失去或得不到群衆基礎支持却是致命弱點。

社運的作用除了是對個別社會上不公平的事件作出爭取，更有在運動中提高政治意識和結合出一套基層取向的意識形態以及政治綱領的效能。香港的社運經過七十年代的發展後，八十年代出現的區議會把不少的社運份子吸納入行政機制之內。而香港社運的第二次高潮便從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開始。當時中產階級中的社運領袖和知識份子把主權移交視爲香港民主

化的契機，從而把社運滙流到民主運動上。然而社運及知識份子並不是社運的唯一參與者，有更多的參與者是抱着「民主拒共」甚至是機會主義的心態去加入民主運動。而在中國逐漸與資本家構成聯盟時，香港民主運動就不幸地把着重面從完成社運目標轉移到和中國對抗。不論是大亞灣事件、政制改革、基本法以至居英權都變成中國干預不干預的問題，社運目標亦退居二線，民主派團體逐漸與群衆，特別與基層產生疏離。九一直選更令民主派走議會政治道路，進一步有脫離群衆的可能性。西方政黨政治的經驗告訴我們，很多時政黨會於選舉勝利，獲得認受性後便相對獨立地進行政治角力。而在香港的有限度權力下放的政治結構，民主派極有可能會淪爲有限權力的爭逐者。而失去有力的群衆基礎支持（不只是名義上，在選舉中支持）及從社運中凝聚主動制定議程的能力，民主派將難會在此政治情勢下有突破。

第三部分

五、政黨政治的發展

政黨可被定義爲：「一個意圖通過選擧以奪取政權的政治組織」。依照這個定義，政黨與其他政治組織（例如壓力團體、工會）的最大分別便在於其積極參與選擧及有意於執政，而其他的政治組織卽通常運用比較簡接的途徑（例如會見議員、集體運動），以向政府施加壓力及影響其政策。非政黨的政治組織一般都滿足於透過比較簡接的途徑去影響政府決定，而少有直接參政或甚至執政的意圖。

以上對政黨的定義並非完全沒有問題。在學術上，有評論批評這定義把政黨的目的規範於選擧。這方面的評論指出政黨參與選擧只是一個途徑，以達到更高層的目的。這目的可包括建立這政黨理想中的社會模式又或者純粹是一些個人的利益。所以這評論傾向於將政黨定義爲：「一個自願的組織，通過選擧以奪取政權，藉此實現某些客觀目標或滿足一些個人利益。」

另外，上文的政黨定義在運用於分析香港政治時亦出現困難。基於基本法的規定，直至二〇〇七年，香港的行政長官都不會由直接選擧產生，而立法議會亦只會有一半的議席由直選產生。在這限制下，意圖通過選擧以奪取政權，基本上是註定失敗的，所以現在以選擧來作爲主要參政途徑的組織都不寄望於能夠執掌政府。在可見的將來，相信亦不會有政治組織意圖以選擧來奪取政權，若果我們要嚴謹地跟隨上文的政黨定義，香港豈非直至二〇〇七年都不會有政黨出現？

有關政黨的目的在於以選擧來奪取政權還是更高的社會理想的爭辯，牽涉的範圍既廣且非我們的關注點，而且無論選擧參政是政黨所用的方法還是其目的，選擧參政始終是政黨的特色，以此標準來分野政黨及其他政治組織實是一可循之路。

至於這定義在應用於分析香港政治時所出現的困難，主要是因爲這定義源自於西方，這定義的運用已預先假設了西方政制的存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選擧是決定權力分佈的最後卡。而香港的政治制度明顯有別於西方，所以直接運用西方的政黨定義會引致分析上的困難。

我們須要一個政黨定義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指出一個的範圍（一個政治組織的小集(Subset)），以方便分析這小集（Subset）內的政治組織。旣然西方的定義在香港並不適用，我們不妨大胆把西方的定義略作更改，以配合香港的實際環境——把政黨定義爲：「一個積極參與選擧的政治組織，其有意於在立法議會內成爲主導勢力。」在此定義下，「港同盟」、「自民聯」明顯地是雛型的政黨。

▲政黨的出現是否有利香港

按照西方的經驗，政黨發揮着多方面功用：(1)政治領袖的培養——政黨往往是政治領袖的溫床，它能提供有意參政人士多方面的訓練及經驗（

例如如何動員群衆及分析社會問題），另外政黨亦會支持他們參選，助他們踏上參政的旅途。(2)政治社教化——政黨亦擔起了教育群衆的責任，在日常的宣傳活動中，政黨灌輸了公衆不少的政治常識，亦引起了公衆對政治的關注，對提高公民意識是有一定的帮助。(3)利益的結集及表達——在社會中，一般的群衆會顯得零散及缺乏團結，政黨的存在便可將有共同的群衆團結，結集他們的利益及力量，向政府表達以爭取滿足其利益。(4)政治溝通——政黨亦可作爲一道政府與公衆溝通橋樑。政府經常有需要就各方面的政策向公衆諮詢意見，除了採用一般的意見徵詢的方法（例如問卷調查）外，徵詢政黨的意見亦是一可行的途徑。

政黨的各方面正面功能並不代表政黨的出現絕對有利於社會的發展。Robert Michel便以其名句「寡頭政治的鐵律(Iron Law of Obligracy)」來提醒我們政黨政治的危險。Robert Michel指出政黨無論內部外部往往都有壟斷的傾向，結果權力集中於少數人的身上，形成寡頭政治。政黨不再發揮着提高公民意識及集結利益的功用。反之，政黨成了少數精英灌輸群衆意識形態及控制群衆以謀個人利益的功具。

要論斷政黨的本質並不能停留於理論層次。以上所提的都只是政黨可能帶來的效果，要得到更深入的了解，我們必須要將分析落實於實際的社會環境及政黨運作中，寄望不必分析實際的環境而得到千遍一律的答案是一個美麗而永不實現的夢境。

觀乎香港現今的政治環境，政黨的發展不論雛型，短期都不會發展成權力壟斷的情況，而且在基本法的限制下（行政長官並非是直選產生，立法局的成員由多種途徑產生，中方在香港保留「適當」的權力），政黨要壟斷權力亦非常困難。反之，就現在普遍的公民意識及政治參與不高的情況，政黨的出現可成爲一道刺激，引發更多公衆人士去關注、參與、議論政治。總括而言，政黨的出現對現在香港政治是利多於弊的。而長遠的政黨政治的發展方向是好是壞，即要視乎各方勢力如何調節政黨的發展，各政黨如何發展內部民主，其他非政黨的政治組織的發展因素的交义運作。

▲香港的客觀社會環境是否支持政黨政治

隨着九一直選的迫近，多個更具政黨形式的政治組織，例如港同盟、自民聯及香港民主促進會。這些新形成的政治組織無論在財政、組織結構及會員數目上，都優勝於以往的政治組織。更重要的是，這些新政治組織明顯地表示出其參政的意慾，參與選舉以求進入決策機關幾近成爲這些組織的首要任務。相反地，雖然舊有的政治組織都有派出會員參與三級議會的選舉，但參與選舉顯然不是這些舊有組織的首要工作，例如滙點便曾強調論政才是其組織的首要目標，參與選舉只是希望更有效地將其意見傳遞至決策機關，而工聯會的首要工作亦顯然不是參與選舉。

雖然新形成的政治組織是更邁向政黨的模式，但亦有不少論述批評這些組織依然與理想的政黨相距甚遠。在財政方面，除了工商派的政治組織外，其他的都顯然缺乏足夠的收入來應付日常開支及選舉費用，港同盟便多次對外表示其財政的拮据。在會員

數目方面，這些通常都只擁有數十至數百的會員，就算號稱「民主派大哥」的港同盟亦只有五百名會員，這與香港六百萬人口相比，顯然是少數目。另外，這些組織亦不見有嚴厲的黨紀，在多次事件中都出現發表與組織相衝突的意見（例如在船民事件，部份港同盟的區議員便表示出與組織相違的立場，在取消死刑事件，自民聯的立法局議員亦沒有跟隨組織的立向在立法局內投票）。顯然，從現今各組織的財政、組織結構、會員數目、黨紀等主觀因素來分析，它們都缺乏一個完整政黨的規模。但是，現今香港的政黨只是在發展中，成長期中的政黨缺乏嚴謹的規模是可以理解的，從這點去斷定政黨政治的灰暗前景未免是過於牽強。以下我們便換個角度，從香港社會的客觀因素去作出分析政黨政治的前景。

普遍的論述認爲香港的政黨發展的障礙來自於香港的政治文化、中方的反對及本港政治制度。一直以來，在經濟的高發展及獨特的文化背景下，香港人的政治文化都普遍偏低，市民對政治充滿無力感，缺乏參與政治的興趣，甚至有抗拒政治參與及政黨的傾向，這些都顯示在香港的低政治參與及市民政治知識的貧乏上。偏低的政治文化將會削弱香港政黨的群衆基礎，而群衆基礎即是政黨的重要支柱之一。在議會的道路上，政黨須要選民的支持才能在選舉中勝出，亦須要群衆的支持才能在各項社會決策上對政府產生壓力。因此，香港偏低的政治文化被認爲是政黨發展的一大障礙。但這些有關香港政治文化的分析即未免不夠全面。在「　政治文化不成熟」這相當空泛的學術用詞下，並未有再進一步分析香港政治文化的實質內容。現今香港的政治文化普遍被認爲是源自市民根本缺乏政治參與興趣或討厭政治。其實，這現象還可被理解爲市民缺乏實質影響力所產生的無力感的必然結果。兩套分析有相反的政治含意，前者引伸出一個保守的繪圖——香港的政治將會長期處於低水平，開放政制將會得不到市民的積極支持，健全的政黨政治亦難以成形，民主之路注定失敗；後者即引伸出低政治文化是普羅市民被剝削去公民權的結果，在權力結構對市民的限制被取消後，無力感將會逐漸減少，加上本港的普遍高教育水平、傳媒發達、及高度城市化等基本有利因素，香港的政治文化是有增長的潛力的。現今的分析顯然在未有充份考慮下，便扣了普羅市民一朵「必然政治冷感」的帽子。

另外，在本港的經濟及工業發展下，香港興起一班專業人士及管理階層，這班中產階級在政治上是比較活躍的一群，他們對比於工人階級有更有利的位置（例如教育水平較高，收入較平穩）作出政治參與，在過渡期內新的權力結構形成的時候，相信這班未被舊權力結構吸納的半精英將會積極參與以爭一位置。當然，我們不應排除部份中產階級以專注其事業及移民等策略（及放棄政治參與）來鞏固其利益，但總括而言，中產階級將會成爲香港的政治及政黨發展的一大支柱，現今剛成立的政治組織便多是由這班半精英策劃而成的。顯然，認爲香港政黨因爲在低公民意識下缺乏市民參與而注定失敗的診斷是站不住脚的。

▲中方的壓力

在過渡期內，中方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透過對本港左派勢力的動員，外交途徑與港府交涉，或甚至單靠其輿論的影響，中方都能有效地影響本港的政治環境，八五年的「本子風波」所帶來的反政治化後果，八八直選中方動員左派工會爭取「要飯票不要選票」，近期的機場事件只是一個印證。普遍來說，中方被認定爲是反對香港出現政黨，而這便形成本港政黨發展的一大障礙。但其實，中方對本港出現政黨並沒有表示過淸晰的立場。而中方最重視的應該是能否有效地在九七後管治香港，讚成香港發展政黨政治與否，對中方來說只有工具性的意義。當然，在完全沒有限制下，中方會選擇否決政黨的出現，以避免有任何強大政治勢力的出現，威脅其對本港的「有效統治」。但在實際情況中，某些客觀條件是限制着中方的決策，直接干預香港以求阻止政黨政治的發展將會引起港人對九七後「高度自治」的信心危機，加速移民潮，及將會受到本港「民主派」的強烈評擊，引起社會動盪，有效的統治更難成事。在反對政黨政治的發展要付出高代價下，中方極可能會換過策略，以支持部份香港的親中人士組成政黨（或任何形式的政治勢力），以平衡其他非親中人士（及政治組織）在香港政治的勢力，近期中方鼓勵左派工會及鄉事團體組織起來參與政治，便顯示了中方的現今最新部署，而這行動必然會產生刺激本政黨政治發展的非故意結果。

▲政治制度的限制

在基本法的限制下，本港立法局至二〇〇七年，亦不會有半數的直選議席，而且基本法下的香港政治制度是行政主導的，立法局的權力是有限的，立法局缺乏對行政機關人員的罷免權，相反行政長官卽有權否決討論立法局議員提交的議案，及阻止政府官員面對立法局的調查及質詢，顯然通過選舉只能分享有限的政治權力。在這情形下，通過選舉以達其政治目標的吸引力是有限的，這會影響人們組織政黨以求勝出選舉的積極性。以上的討論未免過於避觀及誤解政黨政治在建立一個健全政制所能發揮的作用。基本法下的政制無疑給政黨發展的一個上限，但亦未致於完全沒有政黨發展的空間。以今年的立法局選舉爲例，雖然只得十八個直選議席，但亦引得不少人士的參與，有五十多人參選，若以每一參選人有二百人的助選團來計選，今次選舉便起碼吸引到過萬的直接參與。另外，我們不要寄望單靠政黨的出現，香港便能走上民主之路。政黨所能發揮的作用是在建制內產生監察權力平衡的機制，我們還須要建制外的公民社會要求更快的政治改革，時刻監察政府及凝聚市民的力量，才能有一個健全的民主政制。若果我們假定我們的公民社會是薄弱的，中方的影響力永遠站在上風，基本法永遠沒法修改，香港政制永遠處於行政主導，港人的民意（包括其民主意慾）永遠沒法影響最終決策，我們不但會對政黨政治前景感到失望，亦會對香港民主前途感到失望。若果我們能採取另一套較樂觀的假定，現在便是我爭取的時候，爭取修改基本法，爭取民主改革，建立我們的公民社會。

▲總結

現今的論述往往認爲香港人缺乏公民意識、基本法下的政治制度、中方無可抵抗的影響力是香港的政黨政治（甚至民主發展）的阻礙。但其實最大的阻礙並非來自這些因素，而是認爲這些因素是不可改變的政治現實的信念。我們假設了這些政治現實後，便出現了強烈的無力感，而亦不會繼續爭取。在缺乏爭取下，香港當然不會有健全的政黨制出現，基本法不會得到修改，公民社會亦難以建立。而這些結果又再互爲影響，缺乏健全的政黨制及民主將會進一步打擊港人的公民意識，亦會使中方的影響力如入無人之境。最後我們對港人公民意識低、中方的影響力強大的信念又再一次加深。這樣我們唯有繼續無力下去，繼續不爭取。

往往社會的改革的進程是難以預先估計的，以西方工會力量的發展史爲例，在一連串的鬥爭之前，又有誰估計到工會會被合法化及會有社會保障制度的設立呢？現在香港的情況亦是這樣，基本法能否修改、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是難以預測的，既然一個消極的假設只會令問題惡化，我們爲何不以一個較樂觀的態度去爭取呢？

六、香港各政治力量的發展與前景

討論香港政治團體進一步發展的形態時，為方便分析，我們把它們分為三類：工商專業政治團體、民主黨派政治團體及親中政治團體。並就它們各自的組織發展、政治取向、支持的群衆、政治位置四方面作分析，最後對三類政治團體未來關係作一總結。

工商派

香港現時的工商專業團體包括自由民主聯盟及香港基金；而勵進會及民主促進會亦有頗強的工商專業團體色彩。較諸民主派團體，工商專業團體更強調與中國政府保持良好的關係，例如自民聯六點工作目標之一，便是促進及維持中港互相信任和合作。中國政府希望未來的香港繼續保持現時的經濟發展，亦願意工商專業界人仕對政府的施政有足夠的影響力，並鼓勵工商界人仕組織政治團體。基於未來中國宗立國的地位，它對香港的政治發展將有相當的影響力，中國政府對工商專業團體的肯定將對該等團體的發展有一定的帮助。

儘管工商專業政治團體宣稱支持民主自由及人權，但觀乎它們成員以往的言行，例如八八直選及基本法制定時的態度，我們相信它們將較其他民主派政治團體；在發展民主、自由及人權的步伐及程度上相對保守。香港市民雖然注重實質的經濟利益，不太重視政治團體的意識形態，但由於過往享受慣自由、恐共的心理及六四的陰影，他們一般對民主自由及人權持肯定的態度。工商政治團體予人不支持甚至反對民主自由及人權的印象，這點對它們將來爭取廣大市民的支持，將構成障礙。

現時實力較強及有潛力的政治團體，大多只成立數年，它們的組織發展仍未成熟。而工商政治團體較諸其他政治團體，在這方面更為不利。現時工商政治團體面臨的問題包括組織嚴密程度低及群衆基礎薄弱。

工商界人仕儘管希望他們的利益能充份被表達，但却甚少願意棄商從政，現階段又缺乏足夠聲望的代言人，在沒有足夠人材下，工商政治團體只好吸納一些政見相近的人仕，但他們對該等團體的承擔及認同較弱，造成組織嚴密程度低，例如在三月區議會選舉中，便有部份自民聯支持的候選人，恐怕自民聯只關心中上層人仕的印象會影響選舉成績，不願公開自民聯支持的身份。另外不少工商人仕同時是多個政治組織的成員，令會員向心力減低。組織嚴密低將令工商政治團體對其成員的控制力減少，影響其發展至一個能監督成員的政黨的可能性，缺乏代表工商政治團體的人材，將令工商界人仕在議會中的影響力減低。

工商政治團體能否在將來解決人材不足的問題，很大程度視乎該等團體能否被一般市民所認同及對香港的影響力。而此兩點則決定於工商政治團體的群衆取向及政治取向。

現時工商政治團體予人的印象是代表工商及中上層人仕利益，但這取向並未被一般人所接受，在區議會選舉及市政局選舉中，工商界政治團體較諸民主派及親中團體的成績為差，甚至部份受工商團體所支持的候選人不願公開其身份的事件，均顯示這一種情況。部份工商界人仕亦明白這問題，並嘗試以一個跨階層的政治團體角色，取代只代表工商專業人仕的形象。勵進會便是最佳例子，但自八六年成立以來，其成績並無大之進展。自民聯即使聲稱會照顧整體香港人的利益，但成員過往的表現，令市民對此政剛缺乏信心。甚至對於是否走跨階層路線，或是只代表工商界的利益，自民聯內部亦曾有不少爭論。隨着政黨政治的開始，工商政治團體若要在議會中爭一席位，必須擺脫只照顧一部份人利益的形象，爭取被香港市民所認同。

相對於外國的選民，香港市民並無強烈的意識形態，只集中於實質的利益考慮。因而政治團體的政治取向將影響其受支持的程度。如上文指出，工商團體排拒香港民主發展的形象，對它有不利的影響。而在一般民生及社會事務如福利、房屋等事務上，相對如民主派親中派政治團體，工商派人仕並無參與的經驗，亦無具體的整體路向或安排，只有對個別的事件，如船民問題或通脹問題作出反應。工商政治團體本可透過其雄厚的財力及人力，對香港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民生問題作深入的分析，並提出全面性的意見，但直至現在，它們並不能充份利用此優點，例如香港基金雖有此目標，但具體的意見發表却未能全面推廣。

雖然工商政治團體的發展有以上種種的不利因素，但它們與現時港英政府及中國政府的關係友好，而將來政治制度將受宗主國影響，工商政治團體可透過間選的方式進入議會，而將來的特區政府，亦可能藉工商政治團體，聽取工商界人仕的意見，令工商政治團體在議會及政府內仍有相當的影響力。

民主派

在香港三大政治陣營中，民主派的發展步伐可算是最快的一派。自中英聯合聲明以後，港人對香港前途及政制發展等問題都開始關注，不少論政團體如滙點，太平山學會亦相繼成立。故民主派的發展過程大可以八四年為起步點，經歷八七太平山學會、滙點及民協開始討論的「三會合一」，八九年中國民運的民主及政治意識的刺激、九一直選之鞭策下，民主派可謂在「自我膨脹」中，成為一股政治新力量。惟另一方面，民主派就人手、財力、資源等各方面都遇上局限，加以悠來以久之所謂「山頭主義」、「小圈子心態」，都限制了民主派之團結及發展。本文將集中探究民主派中之滙點、民協、民促及港同盟，旨在對民主派進一步發展的形態作一概括性分析。

從西方對政黨定義的角度，民中派中並不存有眞正的政黨。觀乎各團體之組織發展，却可見以下特點：組織嚴密程度不足、群衆基礎薄弱，不離二、三百人的「小團體格局」，意識形態不淸及朝向政黨發展。

滙點成立於八三年初，從「滙點路向」兩句宣言：立足香港，爭取市民權益，建設美好社會；胸懷祖國，關心中國發展，發揚民族精神，可見其先香港後祖國之實事求是精神。組織以會員大會爲最高決策機構，以執行委員會及評議會依章處理會務，下設若干政治委員會及工作小組以協助推動工作。七年來，滙點一直拓展地區支部，包括中西區、九龍東、新界東、新界北等，以增強其民衆基礎。而主席張炳良強調，滙點仍會朝政黨化的道路發展，絕不會走回頭路，回復以前論政團體的角色。

民協於八六年成立，是由多個論政團體，地區民主關注組織和議員辦事處所組成。組織設有執委和評議會外，亦相繼成立多個工作小組，就有關問題如基本法，社會政策進行研究。成立初該會宗旨在於爭取港人高度自治及促使社會資源作合理分配。民協雖爲參政團體，但八九年底大會將通過步向政黨化，以適應現時之政制改革。爲進一步政黨化，民協現正發展更多地區支部、功能支部，並將會先鞏固及穩定中央系統，包括加強現時政策、參政及內務三個部門工作，設立政策研究中心、增設選舉基金等。（見於民協政黨化工作小組意見書）

如果説民協是代表基層的民主派，民促（香港民主促進會）則是工商專業界的民主派。民促成立於九〇年中，組織主要有常務委員會，下設六個常設委員會如行政、公共關係及財政等。該會將以香港事務爲主，不會參與中國事務。就組織發展而言，主席梁智鴻謂將會朝執政黨之目標，故該會期望在全港十九區設立地區聯絡處，並向草根階層展開工作，不過這只是暫時構想，並未有進一步詳情，故民促之群衆基礎亦較薄弱。

就組織發展而言，港同盟可謂最具政黨的雛型。由本港民主派主流組成的港同盟，其宗旨亦在於致力本港事務，無意參與或介入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地區政治。組織結構上，港同盟則見得較爲嚴密，其最高權力機構爲中央常務委員會，下設有中央委員會，評議會及紀律委員會。中委會於會成立不久即通過成立十個委員會以執行會務，其中地區事務委員會將計劃成立十個地區支部，主要按九一直選的九個區域劃分；而功能事務委員會則按立法局功能團體選舉的劃分成立十五個功能支部。由於港同盟係由民主派主流所組成，一些民主派有群衆基礎的區域，如中西區、青衣、屯門等的居民服務處，民生關注組等亦將紛紛正式打正旗號易名爲港同盟地區支部，可見港同盟較有一定的民衆基礎。

就政治取向方面，雖同謂民主派，但由於各團體之成員組成，發展過程、階層利益取向、隱然存在的意識形態上的不同，故除在政制改革之目標及路向稍有共識外，諸如中港關係之處理、社會福利、經濟政策等方面都存有不少分歧。

滙點一向的政治立場是支持香港於九七後在中國主權下，實行港人治港，推動香港政制的民主化。在社會政策方面，則認爲社會資源分配要合理化，目前分配不合理，對中下階層不利，但滙點考慮政策時則會從整體社會利益考慮，而非只爲某一階層。

在中國關係上，與港同盟不同的是滙點認爲要對中國有參與，不過參與會有所局限，以立足香港爲主。

民協的政治取向方面較爲鮮明，爭取在中國主權下的港人高度自治，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則；並倡導民主政治，爭取立法局實行直接選舉，維護香港的司法獨立及港人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在中國關係上，則肯定香港爲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並支持「中英聯合聲明」，將會與其他中國政權和政治組織保持互相尊重、互不從屬的關係，並按中國情況進一步考慮與中共的關係。由於民協的中下階層利益的傾向，民協要求社會資源作合理分配，改善中下階層的生活質素，此與滙點在此方面的立場有些相似，稍不同的是在社會政策與製訂及各類社會服務的運作及管理上，主張朝着民主化及有市民大衆參與的方向發展。

也許是由於民促會的「會齡」尚淺，其政治取向較爲不清。政制改革方面，民促如同其他民主派別，都主張保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之類的目標。在社會及經濟政策方面，其主張、取向都未有明確的立場，而在這方面會否與其他民主派別的起衝突的問題，主席梁智鴻也坦言謂該會並未落實討論。在中國關係上，民促比滙點及民協似顯得較溫和，主張不參與中國事務，而若涉及香港地區事務時，則會發表意見，至於中國國內事務就會通過其他角度來批評。雖然民促並無淸晰的政治取向及嚴格的政綱，但作這般的「民主陣線」形式的團體，只要一般地爭取政制民主化便成了。

作爲民主派中的「大阿哥」，港同盟在政治取向似較爲鮮明。觀其成立宣言中，港同盟在政制改革方面也是竭力促進「中英聯合聲明」之執行，落實「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社會及經濟政策方面，則致力培養公民意識，提高民主素養，鼓勵市民參與公共事務；改善民生，尤其教育、醫療、房屋和交通等各方面；提高生產力，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發展一個健全和適合香港環境和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雖然港同盟成員中不少來自支聯會，但其在中國關係之處理顯得溫和及「敬而遠之」，強調是地方性政治組織，無意介入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地區的政治；但却會維護香港市民的利益而參與和抨擊國家事務。

落到民主派爭取那一類群衆支持這一命題上，一般人都會視民主派的實力來源自基層，這是由於在過往，基層的社會運動和地區選舉，培養出不少民主派要員，而民主派的形象也一向和基層緊密結合，甚至被視爲基層的代言人，可知民主派基本上是爭取基層人仕的支持，但其措施及實際成績如何，將是本段的討論焦點。

作爲民主派年資較長的滙點，過往是先在新界東及新界西建立地區支部，作爲打入區議的據地，爭取基層人仕支持。而主席張炳良亦表示該會工作方針「三腿走路」的其中一腿是透過地區工作，建立滙點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並將滙點對其中央政策的看法帶入地區，爭取地區市民的支持。

打着代表中下階層利益旗號的民協，自其成立以來，一直是深入基層爭取支持的措施如設立分區支部，聯

絡地區組織等。不過在民協於九〇年中所提的「政黨化工作小組意見書」中，則建議增強向各階層推銷民協形象，主動在各階層吸收新會員，爭取專業人士的加入。可望日後的民協不會再只向基層「埋手」，而漸偏向「多階層」的推銷。

由多類專業人仕及工商家所組成的民促會，其爭取支持的仍會是基層。主席梁智鴻謂該會爲朝政黨路向發展，將會向草根階層展開工作，將在全港十九區設立地區聯絡處，而實質工作有三點：㈠搜集各階層意見；㈡學習民主政治參與；及㈢灌輸民主原則。

在港同盟的成立宣言，其政治取向是多方面及鮮明的，但其在政治哲學問題上迴避基本意識型態，而階層利益問題上缺乏明確的取向，以致在討論它在爭取那一類群衆支持的命題上顯得撲朔迷離。究竟是走中下層路線、中上層路線、或是其所謂跨階層路線？至今仍不明朗。

至於民主派在爭取基層支持之成績如何，則未見理想。踏入九十年代，民主派積極活動邁向政黨化；但相對來說沉寂的基層似未因上面鬧哄哄的組黨氣氛所動。而這種上下的差距，在近年來民主派在基層發展中已露出徵狀：一向被視爲民主派實力來源的基層，不獨和民主運動顯得疏離，更有被其他地方勢力（如左派組織）吸納的趨勢。

在政治位置這一分析點上，筆者將先從宏觀上討論民主派在香港的政治位置，繼而分析縱觀上民主各派別之政治位置。

在本文的引言中，早已提及過六四事件後，民主派在香港「自我膨脹」的現象，這由於經過屠城事件後，政制民主化步伐明顯加速，爲了配合新形勢，民主派活動變得活躍，表面上在三派陣營中民主派較爲突出，政治位置亦較高，但實際上民主派是存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影響其將來的政治位置，就人手、財力及資源等，民主派永遠及不上工商派。在與中國關係上，民主派（尤以港同盟），都比不上工商派及親中派。在群衆基礎上，一如前述，民主派的基層發展趨勢未見樂觀，反觀左派組織，民主派更形失色。再論民主派的團結而言，更因「山頭主義」、「小圈子」心態之下而不見得好。儘管現在民主派的政治位置提昇，但由於種種潛在的局限，可能在將來出現「龜兎賽跑」的結果！

微觀各民主派別的政治位置，則顯高低分明。滙點雖爲年資較長，但仍處於参政團體之格局。況且，由於滙點並非選擧導向，因此在搞地區工作時，亦不是全爲選擧而設；加上該會較多學者，長於政策研究工作，如果活動集中在地區選擧，不但發揮作用有限，亦重複了其他民主派團體的工作，因此該會將一定程度仍注重其政策倡導和游説工作，此無疑限制之滙點之政治位置。此外，港同盟的成立亦對滙點產生某些負面影響。而主席張炳良雖謂會積極参與直選，却只寄望能取得零的突破，可見滙點對政府的制衡力，議會中的影響力等不會太高。

論到民協的政治位置，相對之下是較爲低。首先民協作爲一中下階層之政治團體，其財力資源實在有限。而且，不少成員都離開民協而加入港同盟，令民協每年收入減少，就財力及人才資源明顯失色。明星級人物紛紛離開，氣勢不再形象下降，此亦爲民協本身承認面臨危機。雖然民協將朝政黨化發展，並爲此而建議新措施，如多發展地區支部，容許會員代表其他團體競選等，但就現時民協之形勢而言，不久將來其政治位置亦不見會提昇。

新成立不久的民促會，政治位置將有一定潛力的提昇。在會員組成中，多由專業人仕及商家組成，在財政上是有一定的保證。在與中國關係上，該會曾多次向新華社官員反映民促會的成立而中方並無負面的反應。在組織發展上，民促會現正積極向草根階層工作，吸收會員及與地區保持聯絡。現時民促會正爲九一直選籌備，就經費至現時仍不足。可見民促會在短期內，因其財政上，組織發展及本身性質上，政治位置不會高，但其發展潛力是樂觀的。

就政治位置而言，港同盟明顯在群民主派別中佔上優勢。就組織來説，港同盟由民主派中不少「精英」組成，且其地區支部、功能支部等與基層聯絡溝通的橋樑亦較爲穩健。還有的是其成立之初聲勢浩大，自稱爲政黨的它，都得到不少人仕的期望支持，對其日後取得選票有一定的支持。再者，港同盟在應付明年直選的籌備功夫上，更比其他民主派別顯得積極進取，此又在市民心目中建立一定形象。即如外副楊森謂希望取得九個直選議席，可見港同盟不但在民主派中，甚至是香港政壇上有一定的政治位置。不過，正如前述，港同盟在與中國關係上，財政上，意識形態的建立及階層利益取向問題都將爲日後港同盟政治位置動搖的因素。

最後要論的是外在組織，即政治團體之間的關係。在此方面的分析架構將與政治位置般先作宏觀上之考慮。劉兆佳先生曾提出「統治者聯盟」這一個構思，即由九七後中國爲中心聯合工商業者，其他親中國份子及民主積極份子所組成的聯合陣線。不過看看現在三大陣營的發展趨勢及關係而言，這樣的構思難以實現。民主派與親中派一向是對頭，兩派的聯合簡直是天方夜譚。觀乎近期民協主席馮檢基有意夥同建港協會副會長羅祥國在立法局九龍西参加直選，即引起港同盟高層之不滿，謂羅祥國是國粹派，與中國稔熟，又爲建國協會副會長，而建港協會之程介南爲民主派頭號敵人。從此事可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主派與親中派、甚至中間之態度及關係。至於民主派及工商派的關係亦難以拉得合。在衆多的政策，如政制民主化、社會福利政策等問題雙方都出現嚴重的分歧，要民主派及工商派形成聯合陣線談何容易！

「統治者聯盟」這一構思既然難以實現，那麽微觀上的民主各派別的聯盟有怎樣？答案是同樣的難以實現。早於八七年，滙點、太平山學會及民協已就「三會合一」之事開始討論，惟進展緩慢，各會都存在着芥蒂及意見分歧。及至八九年北京民運，「三合」會再次積極討論合一事宜，不過最後始終因爲各會之取向及意見之分歧而不能實現。事實上，民主派是高度概括性的，包容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士，致使矛盾的存在及階層利益取向之不同，如民協代表基層利益，民

促以專業人士及工商人士居多，滙點較走中間路線，港同盟則去向未明，加以社會及經濟政策主張的不同及中共關係處理的問題上都使民主派難以組成一政黨，即使勉強湊在一起，也難免因內部分歧而不能持久，或淪爲爲選舉利便的機會主義組合，又或是雖掛着黨的名義而實際上是選舉聯盟的整合。

至於民主派各團體基本上是維持着合作及友好的關係。港同盟已開始與民協、滙點等團體個別交流溝通，務求找出合作途徑，避免九一直選在選區候選人上衝突。總觀民主派各團體之關係，港同盟是最大的一黨；民協因與港同盟政見不合而漸疏離並自力更新發展成政黨；民促則宣稱其不結盟獨立性；太平山基本上已納入港同盟；滙點甘於論政而只求會員能進入三層架構反映滙點觀點即可。可見民主派仍是山頭分立，「統一民主黨」的組織難以形成。

親中派

明年的三級議會選舉，親中陣營的參選受到各方人士的關注，看看在中方背後支持下，親中派的眞正實力有多少及能染指多少議席，從而左右香港的政壇。

一段有關親中陣營動向的報導及評論，焦點都集中在已有四十二年歷史的「香港工會聯合會」（以下簡稱「工聯會」）及成立於本年二月的「建港協會」。其他有親中色彩而又有意參選的組織，例如新界社團聯會、散於各區的街坊會及互助委員會等，由於估計在選舉中影響只及至市政局及區議會而非最重要的中央立法局，因此本文亦只以「工聯會」及「建港協會」爲分析對象；而亦由於後者建會尚淺，發展及影響力皆遠不及前者，因此在本文的討論中「工聯會」會佔較大的篇幅。

就組織發展而言，「工聯會」經歷了四十二年的起起落落及風風雨雨而仍能屹立至今，相比於各路準備參選的人馬，組織明顯較爲嚴密。「工聯會」的會員人數有十七萬，屬會八十二間，主要爲藍領工人階級。會員人數固然遠超目前最具政黨雛型的「香港民主同盟」（會員五百多人），相較於其他工會組織，如右派親台的「港九工團聯合總會」（會員二萬多，屬會七十一間）及新近成立的「香港職工會聯盟」（會員約九萬，屬會三十多間），在人數及動員能力方面亦佔了優勢。意識型態方面，「工聯會」理事長鄭耀棠直不諱言該會是一個「親中」的工會組織，尤其在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及「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愛國」並無不妥。不過該會走一條較爲「本地化」及「務實性」的路綫，「堅持愛國愛港，擴大工人團結，爭取合理權益，參與社會事務」。

相對而言，「建港協會」的會齡迄今（九〇年十月）只有八個月，創會者主要爲去年六四事件後「港人建港」及「十大建設」運動的發起人。該會會員人數至今不足一百，以中產階層及專業人士（如專業團體、同學會、區議會、傑出青年等）爲骨幹，群衆基礎較爲薄弱，亦不見得該會有任何行動積極爭取草根階層的支持。由於發展尚淺，該會仍未組織化。路向方面，該會打着「建港」及論政的旗幟，立足及建設香港，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研究過渡期的民主建設、實體基建、人才科技發展和民生建設，意識型態的位置並不明顯。然而由於創會者及執委中有不少具有親中色彩，因此該會亦被傳媒視爲親中的組織。

政治取向方面，「工聯會」以往是以「鬥爭爲綱」，行動的手法甚爲激烈，而意識型態的重要性亦十分明顯，以中國的共產政權爲依歸，對抗殖民地主義及資本主義。經歷了六七年的暴動，形象及會員人數驟降的打擊後，「工聯會」的路向亦不得不隨着現實環境的改變而改變，轉趨以香港爲本位及採用較溫和的路綫爭取及改善工人階級的權益，建立「本地化」及「務實化」的形象。然而在關鍵問題上，「工聯會」仍以北京政府馬首是瞻，使人懷疑該會的自主性究竟有多少及其抗爭對象是誰。例如在勞工問題上，「工聯會」的立場一向較爲保守妥協，強調和資方「協商」及「互諒互讓」，保持和諧的關係，對整體工人權益爭取方面的積極性及主動性皆明顯不足。例如在輸入外地勞工的問題上，由於這項政策有利一直受中方眷顧的資本家的利益及涉及內地勞工的利益，亦有利本港的「安定繁榮」，因此「工聯會」的立場和行動明顯較其他工會組織溫和及緩慢，被批評沒有積極爭取及保障本地工人階級及基層人民的利益。在修改勞工條例上，由於顧慮到資方的利益，因此在爭取「集體談判權」方面態度遲疑，只稍在退休保障問題上有較主動的爭取。

另外，在去年年尾鬧得滿城風雨關於基本法政制改革的浪潮中，「工聯會」在後期突然建議一個與被指爲中方欽定的「一會兩局」方案類似的「立法院兩局制」，而且不少屬會批評該方案是在並未有諮詢各屬會及會員意見下便以「工聯會」的名義向外界宣佈。因此縱使「工聯會」努力建立「本地化」的形象，但一般意見都是指該會仍然是一個「外港內中」的工會組織。

「建港協會」方面，創會者雖然大都有親中背景（如程介南、譚耀宗、馮可強、羅祥國、曾鈺成等），然而該會希望以一個較爲「中性」及「本地化」的獨立政治形象出現。例如在中港關係上，該會主張用協商對話的形式來解決雙方的矛盾，而該會則會保持獨立而非中方的「應聲蟲」或「傳聲筒」。而在「建港」一問題上則採取溫和路綫，和各階層及派別保持聯繫及良好關係。

不過「建港協會」的政治立場仍是頗尷尬，執委方面當然希望以較中立的政治形象示人，但由於會員的親中背景，不免引起外間懷疑其眞正建會的目的。該會關鍵人物程介南由於去年「敎聯會」退出「支聯會」，因此被指「轉軚」；另一方面，由於程介南去年積極協調基本法「四四二方案」抗衡「一會兩局方案」，因此過往與中方的良好關係亦出現改變，正是兩面皆不討好。以程介南爲代表的「中間派」希望能以「新左派」的形象出現，從單純的政治認同（傳統左派）轉變爲理性批評的愛國態度，以香港爲立足點及與各派保持聯繫。這路向會否成功，爲各派人馬接受，視乎在往後的發展上「建港協會」是否眞能以獨立的態度出現，抑或眞的如某部份人士懷疑，該會骨子裏不過是中方希望在香港培養治港班子的另一個親中組織。

面對明年的三級議會選舉，「工聯會」明顯是爭取基層工人階級的支持，而如前所述，「工聯會」的會員及屬會數目是領先於右派及獨立工會。而事實上目前基層利益也主要由工會組織爭取，因爲不少民主派組織的基層基礎其實頗爲薄弱，如聲勢浩大的「香港民主同盟」以中層人士爲主，「香港民主促進會」則以專業人士爲骨幹，只剩「民主民生協進會」有較強的基層聯繫。

不過在爭取工人支持上，「工聯會」其實存有不少隱憂。對內方面，「工聯會」的立場存在矛盾；未必常能在中方及受中方照顧的資方利益和本地勞工利益中找到平衡點。而且由於會員結構逐漸變化，年靑及具有較高教育程度的文職及白領會員所佔比例越來越大，他們對本身利益及福利的認同大於對國家民族或任何意識型態的認同，對自己的權益有較高的認識。而且「工聯會」領導層亦呈現老化，重要職位仍由老一輩及南下內地人士把持，而且處事手法欠靈活，會內溝通渠道亦現不足，引起年靑一代會員的不滿。

對外方面，雖然右派親台的「港九工團聯合總會」近年的發展停滯不前甚至有倒退的趨勢，但新近崛起的「香港聯工會聯盟」則來勢洶洶，目前已有會員九萬及三十多間屬會，而且意欲團結二百多個獨立工會（會員二十四萬）以與傳統的左右派工會一較高下。「香港職工會聯盟」以香港爲本位，對勞工問題態度積極，反應迅速（尤其輸入外地勞工的事件）；策略亦突破了傳統工會只求保障工人權益的守勢而銳意改革爲積極的爭取。而且形象開放及年輕化和本地化，和民主派的關係上既有聯繫亦能保持一定的獨立，因此對新一輩及白領工人階級及衆多「游離」工會有一定的吸引力。實際上「工聯會」近年由於在不少勞工問題上態度保守妥協及反應緩慢，因此已開始失去了工人運動上的主導權，而會員數目六、七年來停滯徘徊於十六、七萬之數。相反，不少獨立工會有靠攏「香港職工會聯盟」之勢，而右派工會因過往與左派工會的諸多傾軋（如選擧代表進入勞工顧問委員會），也有與獨立工會聯盟參選的可能。踏入九十年代，面對其他工會的挑戰及勞資關係更形緊張，「工聯會」若不能在形象上作出突破及調整策略，未來發展前景未容完全樂觀。

「建港協會」方面，相信目前不會以高姿態參與明年的三級議會選擧。執委程介南強調該會屬論政性質，會方不會主動派員參加，個別成員參政亦只是個人決定。不過，一般相信「建港協會」並非不放眼選擧，只是希望在開始時能首先逐步建立形象及基礎，爭取市民對他們的認同，不把他們看成中方的代言人，才演變成參政組織。而事實上目前「建港協會」的參選條件並不成熟，除了規模小及群衆基礎薄弱外，對中層及專業人士的吸引力也不及民主派及工商派。

實際落到估計未來親中派的政治位置的問題上。由於三級議會中以立法局的權力爲最大，因此本文的討論也集中在立法局議席的分配上。「工聯會」方面，功能組別勞工界的兩個議席點票方式是用一個工會一票來計算，工聯以八十二個屬會的數目領先右派及獨立工會，因此應可穩取其中一席，而目前勞工界代表之一譚耀宗，便是「工聯會」幹事。在直選議席上，九個選區中的九龍中一直是「工聯會」的根據地，因爲該區乃「工聯會」會所的所在地及傳統工廠區，而左派在該區的多年發展亦已建立了一定的群衆基礎，尤其與街坊派的關係更十分良好，故此奪取九龍中其中一個直選議席的機會甚高。不過在其他地區，「工聯會」則沒有勝算把握，一來會員散佈各處，缺乏九龍中內的組織化的凝聚力；二來大選區也削弱了傳統有親中傾向的街坊及新界勢力在動員拉票上的優勢；而最重要的阻礙因素，是「工聯會」內部欠缺有條件、知名度及參政意識，同時又獲得衆多屬會支持的會員參選。稍具實力的只有副理事長陳婉嫻，餘下已缺乏人選可支持。至於支持獨立候選人參選的一途，由於根據過往市政局及區議會選擧的經驗，不少由「工聯會」背後支持的人士，當選後不受控制，因此在重要性更大的立法局上，「工聯會」的行動更謹愼。

然而，雖然一般估計「工聯會」在整個立法局中所得的議席不多，不過中方也希望「工聯會」採取較謹愼、寧缺勿濫、貴精不貴多的態度，因爲直選議席始終只佔立法局全體議席不足三分之一，中方最顧忌的民主派不會成爲大多數；而且其他派別，尤其是功能組別的議員，在不少事項上與中方的利益及立場分別不大甚至一致，而確實有不少人甘心自動爲未來的「米飯班主」作代言人。加上六四事件後，中國也不希望以高姿態直接揷手本地的政治，尤其是民間組織參選一環，以免引起香港市民對北京政府的進一步恐懼或反感。

「建港協會」方面，一來該會希望先打好基礎才由論政發展成參政，二來雖然不少會員具備專業知識及才能，有條件參與競選，不過該會目前仍欠缺群衆基礎。拉攏獨立候選人合作方面，「建港協會」的吸引力亦不及工商派及民主派。該會的執委中以程介南最有機會參選，程介南爲「香港敎育工作者聯會」的會長，在動員選民方面較其他執委具優勢。不過假若程介南競選落敗，「建港協會」能否染指立法局議席頗成疑問。不過如前所述，競選三級議會並非該會當前的首要目標，因此對該會的發展影響不大。

雖然親中派在立法局內取得的議席估計有限，不過並不代表親中派背後反映及代表的中方利益在議會內沒

有影響力及制衡力，或香港政府對他們不予重視。事實上由於中國是香港未來的主權國，而過渡期內本港的安定繁榮及港府的順利施政及管治亦依賴北京政府的合作和反應，因此就算在未有直選前，港府不少政策已有考慮到中國的立場，故此有人比喻中國爲香港的「第二個政府」。引入直選後，除了親中派自己所取得的議席外，工商派及功能組別的議員也往往會因各種原因而與親中派「同聲同氣」；加上議案未在立法局三讀時港英政府可能已先考慮到甚至諮詢中方的意見，因此中國政府在立法局內的影響力只會越來越大，不會因爲親中派所取得的議席有限而被削弱。

至於與外界組織聯盟的可能方面，由於「工聯會」本身具有一定實力（尤其是群衆基礎），而且對直選的態度謹慎，因此相信會以獨立姿態出現。何況「工聯會」一直與民主派有隙，本身爭取工人階層權益的立場亦與工商派有衝突，這些都成爲「工聯會」與外界組織聯盟的先天性限制。

「建港協會」方面，除了與獨立候選人合作外，與其他派別合作的可能亦不大，因爲不少會員與民主派一直存有芥蒂，而羅祥國與低度團結的工商派關係亦不見得很好。稍有可能合作的是「民主民生協進會」，因爲「建港協會」執委羅祥國近期加入了「民主民生協進會」成爲發言人，而「民協」的群衆聯繫正是「建港協會」在參選時所急需的，而「建港協會」的專業人士亦是「民協」所缺乏的，形成兩者合作的基礎。

當然，同爲親中陣營的「工聯會」與「建港協會」也有可能互相支持，理由就是一個基層基礎雄厚及具備參選及参政經驗，另一個則可提供專業知識，成爲另一種形式的智囊團。

七、結論——香港政治的幾個課題

一、

政治分析絕對不能脫離價值問題，因爲政治最終是由社會中的人討論該怎樣生活和怎樣去實踐它。因此對於任何政治問題如香港民主化的討論，所謂客觀的分析都只是提醒我們於實踐民主化時所可能遇見的問題及阻礙。至於香港應否向民主化發展，則是一個道德選擇。

二、

無可否認香港的政治發展是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走，然而香港的民主化過程是被計劃定的。制定這個藍圖的是各個政權（中國、英國和香港政府）和資本家，換言之是擁有政治和經濟權力的集團。沒有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人唯有靠群衆力量於權力集團之間鬥爭的空隙中爭取自身的利益。因此無權力的人往解放之路將遇到很大的阻力。

三、

中國並不是很不想香港民主化，但民主化必須在以下條件下進行：中國的主權不被影響；防範英國非殖化的小動作；資本家的利益要被保障。港英並非很積極的想香港民主化，因爲她要考慮中英關係和殖民地政府在香港的有效管治。推行民主化的作用就是：以民意牌增加和中國周旋的政治本錢；光榮撤退，以滿足國際間及國內的壓力；增加合法性以維持有效管治。因此香港「循序漸進」的民主化是姿態上多於實質上的。

四、

保守的政治評論常說開放直選議席會帶來免費午餐。其實這種形式化的說話忽略了實質權力掌握在誰的手上。立法局只能通過法案，批准財政支出和監察政府運作，制定政策的主動權是在港督會同行政局、司級官員及各諮詢委員會如交諮會、房委會及醫管局手上。故九一直選帶來的是輿論壓力多於實質權力。實質權力分佈於官僚層與及官商合作的組織中。

五、

在這種政治情勢底下，無權力者要掌握自己的命運，就要靠組織集體力量，以及發展出一套可行而又能保障自身利益的政綱以作政治掙扎。遺憾的是，照目前的歷史形勢發展下去，香港的民主化過程並不向這兩個方向發展。

六、

本質主義是社會運動的大忌。所謂本質主義是把各式各樣不同的社會問題歸結到一個問題上，以爲把這個問題解決後，便能令其它所謂次要問題迎刄而解。香港的民主運動不幸地走進這個困局內。在恐共心理的影響下，大亞灣事件、八八直選的爭論、基本法的制定、新機場事件、九一選擧的爭論核心以至政治力量的整合都成了抗共與非抗共的問題。抗共成了最高的政治綱領，完全駕御了其它的社會問題。抗共成爲最高政治綱領的殺傷力並不在於這會引來中港對抗的局面，而是在於這防礙了凝聚基層利益的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治綱領和政治力量的機會。

七、

政治團體政黨化是出路嗎？勵進會、自民聯、新香港聯盟、香港民主促進會、建港協會、滙點、民協等政治團體欠缺群衆基礎、運作模式停留在論政團體的階段，只是多了些参政人士論政罷了。港同盟又如何？目前港同盟會員人數仍停留在五百左右；亦不見與其它基層組織有較強聯繫；黨中央事務被選擧所淹蓋，嚴重出現議員主導的情況；政綱仍停留在壓力團體時代的議程和方案。如果上述情況仍然繼續下去，港同盟雖然在名義上擁有群衆支持，但她將會與基層及基層團體開始脫節，甚至淪爲議員同盟和選擧機器。

八、

未來香港政治的運作是二元化的。政制的設計令香港權力結構劃分作兩個部門：一個是受保護的，透過功能組別、大選擧團和委任制等把政治利益像分餅般分給各既得利益組別；另一個是群衆性的。這個部門按照選擧政治邏輯運作，然而政治團體及社會運動的不成熟發展將令她不能有效地政導民意及提出具突破性、可行而又受群衆支持的政治綱領。這種二元權力結構只有令兩個部門之間的衝突加劇，然而這種衝突却不是指向溝通理性以作價值共識基礎。僵化的利益分配結構令精英間之衝突難以調和，社運和政治團體的不健康發展令基層群衆的利益及意願受到有系統的扭曲。在這情況下群衆的反應可能是延續冷漠及無奈的接受，亦有可能是在民主化的幻像破滅後，引致難以控制的社會衝突。

九、

這樣的分析是不是悲觀了點呢？我只知道要掌握自身的命運，就要付出道德勇氣及努力，並要瞭解歷史性的限制和機會，才能改變歷史。

香港大學學生會

社 會 科 學 學 會